

# 參與式預算中的陌生人

林祐聖\*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本文以文化部的審議社造為案例，從社會關係的角度，討論參與式預算的組織者的角色。受到 Georg Simmel 陌生人分析的啟發，本文認為若組織者能與在地人形成陌生人關係，讓在地人同時感到組織者之於在地的「親近性」與「遙遠性」，將更能自由地接觸立場與利益不同的行動者與團體、更能以全面的角度規劃參與式預算、更能讓相關行動者感到組織者的公正，以及更能凝聚立場與利益不同的行動者與團體。本文也指出陌生人並非歸屬地位，組織者需要運用他的社會技能，透過認同工作建立他與在地的陌生人關係，這些認同工作包括特出自己與在地差異的區分性展演，以及壓抑自己與在地差異的合併性展演。最後，根據以上發現，本文對於組織者的認同工作能否成功、哪種類型的組織者比較容易取得陌生人的地位，權威的社會溝通面向，以及參與式預算的動員策略提出討論與建議。

關鍵詞：陌生人、參與式預算、審議社造、關係建立、社會技能

---

台灣社會學第 39 期（2020 年 6 月），頁 39-88。DOI: 10.6676/TS.202006\_(39).03

收稿：2019 年 6 月 26 日；接受：2020 年 5 月 29 日。

\* 通訊地址：300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 101 號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Email: yusheng@mx.nthu.edu.tw

## The Stranger in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Yu-sheng Lin

*Institute of Sociolog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uses a case study on deliberative community-building to consider the role of organizers in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PB)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al sociology. Inspired by Georg Simmel's masterpiece "The Stranger",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PB may reach its ideals when the organizer builds strangership with locals. When the organizer obtains stranger status, the organizer is more likely to mobilize different local groups, set impartial PB rules, and connect local groups with different interests. This article also argues that the organizer has to build strangership through two kinds of identity work to create a feeling among locals that the stranger organizer is concurrently both remote and near. This identity work involves both distinguishing themselves from locals while also suppressing differences to better blend with locals, i.e., compartmentalizing and conflating performances. In the end,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nditions that constrain the organizer's performance as the stranger, specifies what kinds of organizer are more likely to obtain stranger status, and rethinks autho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the stranger,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deliberative community-building, relation-building, social skill*

## 一、前言

隨著民眾對於政府角色想像的轉變，從無所不包的大政府，到追求效率的管理機構，再到強調應與民眾攜手合作的公共治理架構（public governance），民眾參與政策制訂的程度越來越高，美國前國務卿 Hilary Clinton 更公開宣稱世界已經進入「一個參與的時代」（the participation age）（Baiocchi and Ganuza 2016: 2）。在這股公民參與的風潮中，參與式預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可說是最為顯眼的參與機制，從 1990 年代巴西的愉港（Porto Alegre）開始，參與式預算已經在不同國家，上千個以上的城市操作，讓民眾決定政府的預算應該花到哪兒去（Lerner 2014; Baiocchi and Ganuza 2016; 萬毓澤 2015）。立基於參與式民主與審議民主的精神，參與式預算反映從下到上的理念，認為「公民可以也應該對於他們居住的城鎮的預算分配發揮更直接的影響力」（Baiocchi et al. 2011: xi），甚至被學者認為是資本主義社會向真實烏托邦（real utopia）轉型的可能路徑之一（Wright 著、黃克先譯 2015: 44-45）。

在參與式預算中，民眾可以實質地決定部分政府的預算，透過公民審議（public deliberation），他們可以提出目前社區與城市所面對的迫切問題，一起腦力激盪出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再與政府官員合作，針對每個方案編列預算，最後共同將方案完成（Baiocchi et al. 2011; Wampler 2012; Gilman 2016; 林祐聖、陳東升 2018）。<sup>1</sup> 作為一個民主的創新實踐，參與式預算的操作可以在三個層面對於社會帶來助益。第一，最實質地，透過民眾在地知識的納入，可以補充政府制定政策時，過於注重專業與科學知識所產生的盲點，並且讓預

---

1 這裡所指的「共同」在不同案例中有著不同的意義：有些參與式預算的例子如愉港、紐約與台北市，是由政府完成，民眾在過程中監督；有些例子如台灣的審議社造，則依循社造的傳統，由民眾作為主要的執行者，政府則扮演輔助的角色。但是無論如何，政府與民眾均需對於方案的執行作出一定的貢獻，持續參與。

算制定過程的黑箱透明化，讓民眾得以監督，讓預算的編列符合社會正義，確實滿足民眾的需求，讓民眾的生活變得更好。第二，在公共事務上，參與式預算能夠深化民主，化解民眾的政治冷漠，因為參與式預算賦予民眾實質的決定權，使得參與不再只是聊備一格或僅供參考，讓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的動機有所提升。第三，在民主素養與能力的培養上，參與式預算的過程就像是民主的學校，在民眾參與的同時，不僅在其中學習到平等、尊重與合作等重要的民主素養，也學習到如何表達自己的意見、如何與他人溝通以及如何組織社區團體的能力（Mansbridge 1999; de Tocqueville 2003; Wampler 2012; Gilman 2016）。

儘管參與式預算理論上可以改善目前政治運作所造成的問題，在實際上也確有令人振奮的案例，但參與式預算的結果並不總是浪漫，學者就觀察到幾個參與式預算運作的黑暗面。首先，參與式預算可能是複製而非改變既有的權力秩序，這樣的複製無論是來自於刻意操弄或是文化慣習，都使得預算分配並未突破既有框架（林祐聖、陳東升 2018）。其次，參與式預算可能帶來敵對民主的邏輯（adversary democracy），造成民眾的衝突與競爭，而非促成民眾的相互理解與合作，因為在參與式預算的邏輯中，資源仍是有限，如果民眾想讓自己的方案實現，他們就必須讓自己的方案獲得更多的支持，由此造成民眾的分裂而非整合，甚至對於民眾產生所謂的參與挫折（participatory frustration）（Fernández-Martínez et al. 2020）。第三，參與式預算的參與程度通常不高，可能導致預算分配的正當性不足，而由此衍生出的差別參與（differential participation）的問題，意味著參與者可能為特定團體或特定頭人的社會網絡，在參與程度低的情況下，結果很容易就為他們所掌控（Baiocchi and Ganuza 2016）。以上幾個黑暗面的說明，表明深化民主、團結民眾以及更平等及有效地制定預算並非參與式預算理所當然的結果（Eliasoph 2013; Lerner 2014）。

參與式預算在理想與實務之間的落差應作何解釋，不僅引發許

多學者的興趣，他們更希望從此找出可以讓參與式預算順利運作的方式。有些學者從鉅觀的角度說明，指出有利於參與式預算發展的環境因素：在國家體制上，地方分權與良好的財政狀況是妥善操作參與式預算的前提，因為如此，地方政府才能擁有自主的財政權，讓地方民眾能實質地決定預算的編列；在政治氣候上，如果可以獲得首長的支持，而首長又與議會的多數黨同派，參與式預算的運作較能讓官僚動起來，並且避免議會的干擾與杯葛；在公民社會上，若存在著一個具有強大動員能力的公民社會，而這個公民社會又能與政府保持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就可以大大提升民眾參與的程度，並避免參與式預算的過程為政府所操縱（Wampler 2007）。有些學者則從微觀的層次出發，探究討論主持人（facilitator）對於審議乃至於參與式預算的理解，會讓他們以不同的風格主持討論，有些強調討論的效率，有些則著重各種意見的關照，因而影響討論的動力以及參與者所做出什麼樣的決定（Mansbridge et al. 2006; Gilman 2012）。

本文則將焦點轉移到參與式預算的組織者，組織者從頭到尾介入參與式預算的每一個環節，包括初期的規劃與動員、中期的公民討論與投票，以及最後的預算分配與方案完成。雖然周遭的環境因素與內部的討論動力都可能對參與式預算的結果產生不可抹滅的影響，本文則認為鉅觀與微觀因素所造成的影響，主要是由組織者的中介所引起。就鉅觀層面來說，組織者與相關行動者的溝通，可以導引環境對於參與式預算的影響，例如在客觀上看似不利的環境，如果組織者有充分的社會技能（social skill），能讓政府、民意機關與公民團體接受參與式預算的理念，參與式預算就能順利運作；反之，如果組織者缺乏社會技能，即使是再友善的環境都屬枉然。就微觀層次來說，組織者如何動員民眾與安排討論，在在影響討論的進行與結果。

為了說明組織者如何作為鉅觀與微觀因素的中介，本文採取關係式社會學（relational sociology）的觀點，強調行動者之間的互動規律並非由靜態的元素所決定，而是由行動者之間所協商的社會關係所支撐，透過提示行動者當下的情境定義與他應扮演的角色，社會關

係不僅影響行動者對於社會世界的理解，同時也是行動者行為舉止的指引。社會關係在建立之後並非靜止不變，行動者仍能透過展演性的行動（performative action），策略性地改變社會關係，同時改變行動者之間的互動模式與結果（Goffman 1959; 1974; Emirbayer 1997; Fligstein 2001; Polletta 2004; 林祐聖 2012）。將這樣的觀點用於參與式預算的組織者，本文認為組織者與其他行動者的社會關係，會對於參與式預算的過程與結局帶來高度的影響。簡單來說，若其他行動者肯定組織者是位有能力與公正的操作者，他們便更願意支持與協助參與式預算；相反地，當組織者不被信賴時，其他行動者就會感到興趣缺缺或甚至反過來加以抵制。因此，組織者如何透過展演與溝通，和其他行動者建立適當的關係，讓參與式預算的運作能夠鑲嵌其上，將是參與式預算能否克服不利的環境而順利運行的重要因素。

至於何種社會關係較有利於組織者推動參與式預算，Georg Simmel 的「陌生人」（the stranger）分析為本文帶來啟發性的思考（Simmel 1971）。若組織者能夠成為 Simmel 意義上的陌生人，在推動參與式預算時，可以獲得以下優勢：更能自由地接觸立場與利益不同的行動者與團體、更能以全面的角度規劃參與式預算、更能讓相關行動者感到組織者的公正，以及更能凝聚立場與利益不同的行動者與團體。因此，若組織者能夠建構他與其他行動者的陌生人關係（strangership），以此關係支撐參與式預算的運作，將有助於組織者更具包容性的動員與建立讓其他行動者信服的程序與規則，不僅能提升公民審議的品質，讓預算的編列更符合整體民眾的需求，同時更能提升參與式預算的合法性，讓參與式預算貼近原初的理想，不被扭曲。

本文以台灣南部某縣市的蜈蚣區為案例，蜈蚣區公所於 2017 年參與文化部審議型社區營造（以下簡稱審議社造），本文作者受文化部的委託，擔任該區的輔導老師，協助當地公所與民眾操作參與式



預算，以決定該區社造經費的運用。<sup>2</sup> 輔導老師的工作是「輔導進階（審議）社造公所建立因地制宜之公民參與及方案執行機制，注重平等、包容等審議精神的落實」。<sup>3</sup> 本文作者的工作包括定期與平日的連絡、實際運作的規劃、培力課程的安排與審議現場的指導等。在本案例中，儘管公所的承辦費盡心力，卻無法取得陌生人的地位，捲入社區間的愛恨情仇，受到社區的責難，社區領袖仍為參與式預算的主角，社區的競爭多於社區的合作；而相較於與社區較為熟悉的公所承辦，來自於北部，與蜈蚣區毫無淵源的作者卻因為其陌生人的地位，顯得較被公所成員與社區領袖所接受，仍能在一定的程度上維持參與式預算的原則。為了說明以上的論點，本文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本文根據 Simmel 的分析，說明作為陌生人如何幫助組織者操作參與式預算，本文也將從互動的角度，說明陌生人的地位並非本質性的依附在組織者的個人特徵上，而是需要組織者透過適當的展演策略與社會技能而建立與維持；接著，本文將對於蜈蚣區的參與式預算作背景性與本文的研究設計作說明，並以此案例說明成為陌生人對於組織者的重要性，以及組織者如何成為陌生人；最後將說明本文的發現，包括權力的溝通面向，以及從社會關係的角度對於參與式預算乃至於民主創新的推動提出建議。

## 二、參與式預算中的陌生人

根據 Simmel 的論點，陌生人是一種社會類型（social type），指涉「今天才到來，但是明天會留下」（comes today and stays tomorrow）的行動者（Simmel 1971: 143）。來往兩地的貿易商人是

---

2 本研究的資料蒐集均為研究對象所知曉與同意，但為保護受訪者，本文以假名指涉公所、社區與受訪者。本文分析的資料涉及作者在蜈蚣區的參與經驗，從研究者的角度時，本文主要使用「本文作者」與「作者」指涉本文作者，若是從田野報導人的視角，則使用「輔導老師」與「他」，方便讀者閱讀。

3 在該縣市政府的推動審議進階社造的招標文件中，對於輔導老師工作範圍與目標的界定。

Simmel 認為的典型例子，作為兩地的中間人，雖然貿易商居住於某地，與在地居民有著常態性的互動或甚至彼此熟識，但是卻仍不被在地居民認同為在地人（Simmel 1971: 144）。對於在地民眾而言，陌生人既是親近卻又遙遠，與陌生人間形成一種遠近感覺同時存在的人際關係（Simmel 1971: 143）。

社會關係作為社會互動的基礎，陌生人關係形塑著陌生人與在地的互動，Simmel 指出四個陌生人與在地的互動特性。第一，相較於在地人，陌生人具有更高跨越團體界線的能力，更能周遊於立場或利益不同的在地團體中。親近性（closeness）與遙遠性（remoteness）的同時存在，使得他不被在地人認為屬於哪個團體，因此，陌生人「可以不經意地接觸任何一個人，即使他與這些人並未因為家族、地域或職業而緊密聯繫」（Simmel 1971: 145）。換句話說，陌生人與在地的連結微弱，使得他不易落入「朋友的敵人就是我的敵人」的社會網絡定則，讓他比在地人更不會陷入在地的藩籬，更能跨越社會的界線。其次，對於在地人來說，陌生人是客觀中立的，因為既然他不屬於任何一個在地團體，「他就不會受到特定在地成員的牽引，或是受限於某個團體的黨派性格」（Simmel 1971: 145）。只有陌生人才可能具有中立客觀的特性，因為在地人涉入在地社會較深，容易受到自己的團體利益所影響，或是被其他在地團體所質疑，而全然與在地無涉的行動者，只是在地的局外人，會因為與在地人的全然不熟悉，在地人難以對他產生信任。因此，當在地發生衝突時，陌生人經常被推選擔任仲裁者的角色，而在地人也較願意與陌生人分享秘密或小道消息，因為他們知道陌生人不但沒有偏好哪個在地人或團體，也沒有管道把秘密或小道消息傳到其他在地人的耳中。第三，陌生人更能自由與全面性地對於在地事務做出判斷與採取行動，因為他「不會因為與在地人或團體的連帶而讓他對於資料的認知、理解與評估產生偏誤……他的行動也不會受到任何習俗、信仰或前例的限制」（Simmel 1971: 146）。最後，陌生人與在地的關係是建立在抽象，而非特定或內團體的特質，陌生人的親近性讓在地人感到「他們與陌生人在某些



層面上的相似，像是國籍、社會位置、職業或是普遍的人類特質」，遙遠性則讓在地人相信這些相似可以「延伸到陌生人與我們之外，我們可以像與陌生人般的與更多其他人連繫」（Simmel 1971: 147）。換言之，陌生人比在地人更有可能連接不同的在地人與團體，用超越在地人與團體的集體認同，整合不同的人與團體，建立在地的團結。

根據 Simmel 對於陌生人的分析，因為懷有既近既遠的矛盾特性，使得陌生人比在地人更能接觸到在地的不同人士與團體、更能被在地人相信是客觀中立的、更能不受拘束並以開闊視野思考與採取行動，以及更有潛力整合在地的不同人士。從參與式預算的設計來看，若組織者能夠具備陌生人的特性，在推動時，更有可能達成理想的參與式預算。

首先，如果組織者是個陌生人，他將更能包容性地動員在地民眾參與，提升決策的品質與正當性。陌生人的身分賦予組織者更多的連結資本（bridging capital）（Putnam et al. 2004），可以跨越不同的在地社會網絡，進行參與式預算的宣傳，因此更有潛力造成包容性的參與。若組織者被歸類為某個在地團體或派系，很容易就被敵對或不對盤的團體或派系所排擠，不僅難以動員這些團體或派系，甚至連與這些團體或派系領袖的溝通機會都沒有，在社造中，里長與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不合的情況時有所聞，若被貼上里長派的標籤，很可能就無法接觸理事長派的社會網絡，反之亦然（盧思岳 2014；曾旭正 2014；林祐聖、陳東升 2018）。

第二，沒有在地的包袱讓組織者更能說服相關行動者接受參與式預算的意義、價值與操作程序。即使組織者能夠接觸到相關行動者，並不代表相關行動者必然支持參與式預算，他們會因為質疑組織者的公正性而採取排斥的立場。若組織者是陌生人，他之於在地人的客觀性，較易讓相關行動者認為參與式預算是玩真的，並增加他們參加的動機。

第三，組織者的陌生人地位讓他能夠更完善地規劃參與式預算，他可以從全面的角度進行準備，不會因為討好或是畏懼特定在地團體

或派系，而讓規劃有所偏頗，有利於特定團體或派系：例如，透過地點或時間的選擇，降低特定團體或派系的參與成本，讓它們的參與較為容易，或是設計有利於它們的投票規則等。換句話說，即便組織者可以跨越不同的在地網絡進行溝通與宣傳，若溝通或宣傳對象對於整體規劃感到不公正，他們仍可能因為失去信心而不參與。

最後，陌生人的抽象特質讓組織者更能扮演橋樑的角色，將相關行動者團結起來，這樣的優勢可以透過網絡分析中的網絡平衡（balance theory）與轉移性（transitivity）來說明（Heider 1946; Davis 1963; Wasserman and Faust 1994）。假定甲乙是敵對的在地團體，但是作為陌生人的組織者各自與甲乙建立信賴關係，當甲信賴組織者，乙也信賴組織者時，原先存在於甲乙之間的敵對關係，在尋求網絡平衡的壓力下，也會轉為信賴關係，形成正向的網絡平衡。<sup>4</sup> 總結來說，陌生人的特質能夠讓組織者操作一個更為包容、平等以及用合作代替競爭的參與式預算，更能提升決定的品質與合法性、提升民眾對於公共事務的關心，以及作為更具廣泛參與的民主學校。

### 三、關係建構與社會技能

既然陌生人的社會關係對於推動參與式預算有重大的幫助，組織者要如何成為參與式預算中的陌生人呢？從社會建構的角度來說，組織者並非生來就是陌生人，而必須經過關係建構（relation-building）

---

4 網絡平衡與轉移性的討論可追溯至 Heider（1946: 110）有關認知緊張的研究，他指出「在三人組合中，如果三人的相互連帶（tie）在各個層面皆為正向，或是兩個連帶是負向，一個連帶是正向時，可稱為是平衡的網絡結構」。前者為正向平衡，即「朋友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後者為負向平衡，即俗諺「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根據 Heider 的論點，不平衡的網絡結構對於鑲嵌其中的行動者造成認知緊張，讓他們產生動力調整他們的態度，讓網絡結構歸於平衡，追求網絡平衡的論點開啟網絡分析中對於轉移性的討論（Wasserman and Faust 1994）。將此論點用於本文，組織者的出現，讓組織者與在地團體間形成某種緊張的結構，而有調整的必要，若組織者過於靠攏在地，容易陷入在地的敵我糾結，讓網絡結構轉向負向平衡，參與式預算的包容性也會下降；反之，若組織者為陌生人，雖然與在地人避免形成朋友關係，但是在地人至少會不討厭組織者，當在地人不討厭組織者時，彼此原先的敵對關係也會較為收斂，而往正向平衡的方向發展。

的過程。組織者需要透過他的展演行動影響他的觀眾，讓觀眾意識到與接受他的陌生人角色，並以此作為他們與組織者互動的基礎，才能做一個陌生人（doing a stranger）（Goffman 1959; West and Zimmerman 1987）。

在這個陌生人的關係建構過程中，組織者並不總是一帆風順，而可能會受到其他行動者的挑戰，他們可能因為某些因素，想藉由重新定義他們與組織者的關係，重新定調（rekeying）參與式預算的意義，例如，可能有在地團體想拉攏組織者或是離間其他團體與組織者的信任，一旦拉攏與離間成功，組織者就失去陌生人的地位，同時也讓參與式預算的意義在相關行動者的眼中變質，從公正與公開的公民參與機制轉為偏頗的利益分配過程（Goffman 1974; Fligstein 2001; Fligstein and McAdam 2012）。

在這個參與式預算的意義與場域秩序的協商與鬥爭中，組織者的社會技能扮演重要的角色，Fligstein（2001: 105）將社會技能定義為「引發行動者合作的能力」，藉由閱讀身處的環境與互動的對象，具備社會技能的行動者（skilled actor）能夠採取有效的互動策略，突顯共同的認同或利益，激發相同的情緒，建立共享的認知框架，讓彼此的互動鑲嵌於特定的社會關係上，形成特定的互動模式，成為場域秩序的來源。社會技能可以表現在三個面向上：在認知層面上，行動者要對於文化材料熟稔，才能讓別人產生共鳴或是無法反對他的意見；在展演層面上，行動者要具備使用文化材料的能力，了解使用何種展演策略，才能夠讓別人接受他的論述，無論是心悅誠服或是被迫接受；在象徵層面上，行動者本身的特質就可能帶有權力，對於他人造成命令性的影響，讓他人順從（Bourdieu 1991; Snow and McAdam 2000; Swidler 2003; Jasper 2006; Nepstad and Bob 2006; Fligstein and McAdam 2012; 林祐聖 2012）。

如同 George Herbert Mead（1934）指出，雖然每個行動者都具備社會技能，社會技能的質與量卻有所差異，使得行動者在建構共享世界觀時，有著不同的影響力。整體技能較強的行動者，較易將互動

基礎轉換到符合其利益的社會關係，因而在互動上取得優勢，整體技能較弱的行動者，則只能作為當下社會關係的隨波逐流者（林祐聖 2012）。組織者若想以陌生人之姿現身，他就必須要有充分的社會技能，說服他人接受陌生人關係；反過來說，缺乏充分的社會技能，即便懷有強大動機，也不容易建立與維持他的陌生人地位。

社會技能的概念為我們帶來對於場域秩序一種既限制又開放的想像，雖然它著重於行動者的主體施為（agency），並不代表行動者能隨心所欲地轉變情境定義，社會技能的構成與行使仍受到行動者所處的社會結構或環境的限制。在社會技能的構成上，行動者的結構位置與所處環境，形塑他在認知、展演與象徵層面的能力總和，影響其社會技能的質與量。在社會技能的行使上，行動者是否能透過技能的應用，建立、改變與維持場域的共享世界觀，同樣受到他所進入的場域的既存秩序與互動對手的限制，既存秩序可能偏好特定的認知內容、展演方式與象徵符號，使既得利益者佔據上風，同時讓意欲挑戰此一秩序的行動者難以施展拳腳。若互動對手是個高段的社會技能者，不容易犯錯，像是使用不適當的認知內容、展演方式與象徵符號時，重新定調場域秩序便會遭受阻礙。

## 四、成為參與式預算中的陌生人

任何角色的扮演涉及彰顯與壓抑的過程（Goffman 1959），就陌生人這個角色而言，為了維持在地人對於行動者遠近並存的感覺，行動者需要以他的社會技能為基礎，至少同時完成兩項認同工作（identity work）。首先，他要能夠突顯自己的外來者身分，強調自己與在地人的差異，增加他與在地的距離；其次，他要可以壓抑自己的外來者身分，降低他與在地人的差異，讓他縮短與在地的距離（Bernstein 1997）。以戲劇來比喻，社會技能就像是演員的演技，認同工作就像是演員分配到的角色與劇本，不同演技的演員在演出相同的劇本與角色時，演出的結果也有所不同，換句話說，即使行動者知

道要完成什麼樣的認同工作，若他的社會技能無法支撐，他也無法順利完成。

Ann Mische (2003) 有關跨越身分的談話 (cross-talk) 的研究，提供我們了解行動者如何透過溝通，建構既近既遠的社會關係的過程。她認為，這樣的談話可作為關係建構的機制，讓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可以利用運動成員的多元與重疊身分，進行社會運動之間的關係形成與重組，因此可以說明社會運動的增補、拓展、結合與結盟。Mische 將跨越身分的談話區分為兩種型態，第一種是區分性 (compartmentalizing) 的談話，目的在於讓行動者於多重與重疊的身分中，區隔出一個當下的互動共同基礎。在這個談話型態中，行動者有兩個策略可以使用，首先，行動者可以使用認同的限定 (identity qualifying) 的方式，明確指出他的身分與其他行動者的關係，讓此關係成為互動的根據；其次是時間性的提示 (temporal cuing)，行動者可以利用特出短期目標，讓這個短期目標成為身分的標記，使得與此目標有關的身分在當下被突顯出來，忽略其他的差異，讓短期的聯盟成為可能 (Smith 2008)。第二種類型則稱為合併性 (conflating) 的談話，代表利用意義曖昧的談話，避免特定身分的突出，行動者也有兩個策略來達到這個目的，首先是普遍性的轉移 (generality shifting)，指的是行動者可以利用複雜與抽象的身分類屬，包容不同的身分，避免某一身分變成獨特的存在；其次是多重鎖定 (multiple targeting)，意味著行動者以意義模糊的話語滿足不同身分的期待與需求，讓不同身分的運動成員能夠在某種程度上相連。儘管 Mische 把重點放在談話，我們可以將談話延伸至行動者整體的展演行動，換句話說，除了談話，行動者的舉止 (manner) 與個人門面 (personal front) 也可能造成多元與重疊的身分的區分與合併 (Goffman 1959)。

應用以上的論點，本文認為區分性的自我展演可以讓參與式預算的組織者突顯自己與在地的遙遠性，而合併性的自我展演則能讓組織者建立與在地的親近性。也就是說，若想成為陌生人，組織者必須有



足夠的社會技能在適當的場合，運用區分與合併的策略。例如，在制定規則時，組織者要行使他的社會技能，在認知、展演與象徵面上，讓在地人士同意他並非在地的一員，突出自己不屬於任何一個在地團體的特質，避開來自在地的干預，提升參與式預算的公正性；在鼓勵社區參與時，組織者也需要透過社會技能的運用，說服在地忽略他與在地的差異，讓社區願意和組織者齊心，共同為參與式預算努力。更重要的是，他必須巧妙地混合以上的兩種展演，避免成為完全的在地人或全然的局外人。

## 五、案例說明與研究設計

本文的案例為台灣南部某縣市的蜈蚣區，蜈蚣區與幾個位於同一縣市的行政區在 2017 年參加文化部推動的審議社造，希望透過審議民主的引入，突破目前社造所面臨的參與度不足和社區領袖主導的問題（葉欣怡等 2016）。參與式預算正是當年審議社造的主要機制，希望藉此機制重申達成具拘束性（binding）結果的重要性，代表政府必須完成民眾所產生的方案而非讓民眾的意見僅止於諮詢，透過增強民眾的政治效能感來提升參與的動機（林祐聖、陳東升 2018）。

基於兩個理論性的考量，本文選擇蜈蚣區為案例。第一個考量是蜈蚣區提供本文比較的可能性，蜈蚣區長期以來以社區領袖會議作為社造的主軸，不僅養成社區領袖認定自己是社造主角的習慣，而且蜈蚣區的承辦因為比較重視與在意社區領袖的反應，導致無法建立陌生人關係。這樣的情況剛好作為對照組，讓本文得以透過控制行政區的差異，比較在類似的條件下，缺乏陌生人地位的組織者會對參與式預算的進行帶來什麼影響，透過蜈蚣區承辦與擔任輔導老師的作者的對照，讓本文更清楚陌生人地位的影響。<sup>5</sup> 第二個考量，與前者有關，

---

5 其他行政區的社造承辦，雖然同樣了解在地的狀況，與社區領袖在社造業務有頻繁往來，在決策時也不免表現出對於在地政治生態的考量，在過程中也不免受到在地民眾與社區領袖的介入或雜音，但是都並未表現出如蜈蚣區般以滿足他們的需求為優先的



在一個習慣以「在地人」的世界觀與互動模式的行政區中，作為輔導老師的作者，須時刻面對成為「在地人」的壓力。為了成為陌生人，作者必須更費力地運用社會技能完成認同工作，特別是在蜈蚣區的案例中，公所承辦的介入是早於作者，他們的介入讓蜈蚣區陷入在地的糾葛，對於輔導老師建立陌生人地位帶來阻礙，讓他無法「自然」地變成陌生人，因此，藉由觀察蜈蚣區的案例，更能突顯陌生人的社會建構性，更能看到社會技能與認同工作的痕跡。

雖然本文僅以蜈蚣區為案例，並不表示本文的論點是為蜈蚣區量身訂做，而缺乏理論上的意義。就質性研究來說，擴大案例數量並非是增加理論意義的唯一方式，如果研究者選擇與既有理論的預期有所出入的異例，透過異例與既有理論對話，則可以擴充與重建既有理論，這樣的研究意義奠基在知識的累積，「具想像力而謹慎地重建理論，以解釋異常的案例」（Burawoy 1998: 5）。本文選擇以蜈蚣區為案例也是基於類似的考量，從既有公民參與研究中較受忽略的組織者角色，與 Simmel 對於如何取得陌生人地位的理論空白出發，作者在輔導蜈蚣區時，感受到在其他行政區所沒有的緊張。作為一個特例，蜈蚣區的經驗可以幫助我們重新思考組織者在公民參與中的理論與實作的重要性，也補足陌生人概念所忽略的社會建構過程。

蜈蚣區的人口約為四萬，經過公所規劃，選擇蜈蚣區的農業地帶中數個相連的社區操作參與式預算。除了區域選擇以外，蜈蚣區操作參與式預算的方式與同縣市的其他行政區並無二致，包括宣傳、住民大會、提案工作坊、公民投票與執行方案等步驟。<sup>6</sup> 安珀和海倫是

---

情況，例如在古龍區有里長想將票箱設在里辦公室，或是在番薯區有在地團體對於討論所提出的方案感到不滿，兩區的承辦卻是選擇以參與的公平性以及尊重民眾意見的理由，拒絕在地領袖的介入，並未如蜈蚣區般，以台語的「交陪」的方式，個別滿足或降低社區領袖的需要或不滿。換句話說，蜈蚣區承辦更像是「在地人」的理念型（ideal type）。

6 為了提供讀者相關的脈絡知識，以下簡單說明每個步驟的目的。宣傳是透過訊息的散播，吸引民眾參與；住民大會是讓報名民眾分組討論，初選出候選方案，在蜈蚣區的設計中，共舉辦兩場住民大會，參加者限定為實住、設籍、就業與就學於蜈蚣區的年滿 16 歲的民眾，每場設定 60 名參與者，實際參與兩場合計為 110 名，每場初選出四個方案；提案工作坊則是由公所與通過初選的方案的提案代表進行討論，讓方案內容較為細緻並且屬於公所的權責範圍；公民投票則是民眾在初選方案選出前三案，投票

參與式預算業務的主要負責人，兩位均為女性，一人居住在蜈蚣區，另一人則居住在鄰近的行政區。安珀的社造經驗豐富，自 2010 年左右就開始負責社造業務，海倫則是社造新兵。由於兩人在當時並不清楚審議社造的意義與進行步驟，因此仍會以過去對社造的想像與慣例來操作審議社造。由於審議社造才開始推動，文化部為了協助公所辦理，除了安珀和海倫以外，同時聘請作者擔任輔導老師。從先天條件來看，安珀和海倫容易陷入在地的糾葛，而作者因為和蜈蚣區毫無淵源，容易取得陌生人的地位。然而，陌生人關係是在互動中被建立與維持的，即便有著先天優勢，輔導老師仍需要適當的自我呈現才能發揮他的優勢。理論上，安珀和海倫也可透過持續的適當展演，扭轉相關行動者對於他們不客觀的印象，成為參與式預算中的陌生人。

本文的資料來源以田野觀察與深度訪談為主。田野觀察從 2017 年的三月輔導工作正式啟動開始，實地觀察的田野包括各式會議、與社區的互動場合與參與式預算的現場，每次的觀察均做成田野筆記。田野觀察可以提供本文觀察研究對象最為自然的表現，提供更為具體的例子來說明行動者的展演，以及其他行動者對他們的展演的反應，並彌補回溯性資料可能的扭曲與遺漏。深度訪談的核心對象為安珀、海倫與參加參與式預算的幾位社區領袖。<sup>7</sup> 從他們的回憶中，我們可以得知作者是如何運用社會技能，完成區分性與合併性展演，建構與維持自身與在地的關係，並從此了解這兩種展演如何影響陌生人關係的形成。為了作為對照，本文也將從展演的角度，說明安珀和海倫在建立陌生人關係的困難。

---

為複數票，每人三票並需要投完，投票資格則僅以年滿 16 歲為限，進行為期三天的投票，共計有超過八百位民眾投票，雖然對於地域沒有限制，由於此五里地屬偏僻，投票人仍以在地民眾為大宗。

7 社區領袖包括參與此次蜈蚣區參與式預算的幾個社區，如水州社區的阿水、火丁社區的阿良、豐仁社區的阿美與同仁社區的阿龍。

## 六、研究對象即為研究者

在本文的案例中，成功建立陌生人關係的輔導老師即為作者，這種「研究對象即為研究者」的安排，與強調客觀性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典範有所抵觸。在實證主義的傳統中，研究者與研究對象應是分離的，若研究對象即為研究者本身時，分析結果的客觀性容易受到懷疑。面對這樣的懷疑，同時為釐清本文的研究定位，本文在此節，除了說明「研究對象即為研究者」的理論基礎與在研究上可能帶來的幫助外，也對於客觀性的要求做出回應。

實證科學對於客觀性的重視，雖已成為科學研究的主流，卻仍出現對於實證主義的去道德傾向與預設單一真實的反思，包括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與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等，前者認為客觀性使得科學研究成為去道德的研究，象牙塔裡的成就卻造成象牙塔外的悲劇（Horkheimer and Adorno 著、林宏濤譯 2008），後者則主張社會真實的多元性，不同的位置帶來不同的認識，研究者應持續反思他的位置與所產生的認知與權力之間的關係（Cornwall and Jewkes 1995；Corbin et al. 著、徐宗國譯 1998；Burawoy 1998）。在這兩股批判下，兩種與本文「研究對象即為研究者」有關的研究設計應運而生。第一種是參與式研究（participatory research）（Cornwall and Jewkes 1995；Corbin et al. 著、徐宗國譯 1998；盧孳艷等 2003），強調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共同參與和研究的實用性，在參與的過程中，透過經驗，進行自我反省與洞察，最後帶來研究對象的賦權（empowerment）與意識覺醒。第二種是自傳民族誌（autoethnography）（Wall 2008），將研究者的個人經驗視為分析材料，寫成可信的個人故事，主張科學研究的合法性不在於客觀與否，而在於能否對於世界提出進一步的理解。

以上兩種迥異於實證主義的研究設計，指出本文可能的研究定位。從作者作為輔導老師，與在地民眾一同操作參與式預算，不僅讓

在地民眾熟悉這個參與模式的運作，同時有賦權的效果。從做中學，培養在地的公民能力與自行舉辦公民審議的信心來看，本研究具備參與式研究的性質。在自傳民族誌的層次上，雖然本文並非是作者對於其生命脈絡的自我詮釋，本文的分析確實建立在田野脈絡對於作者的刺激與造成的反思。

從資料取得與詮釋的角度來說，研究者的親身參與可以為研究帶來以下助益。首先，相較於以他者的位置進行田野工作，研究者的親身經驗更能讓他看穿研究對象間的互動的表面價值，幫助研究者發現僅是客觀觀察無法察覺的社會秩序。其次，研究者的親身參與所帶來的體會與實踐性知識，正是研究者是否能從他的觀察中，正確地捕捉研究對象的互動意義，並且確認他的詮釋是否能超越本身，而能擴及到所有從事相同行動的研究對象的基礎（Eliasoph and Lichterman 2003; Martin 2017）。最後，研究者的親身參與能夠帶來持續反思的機會，打破理所當然的認識，讓研究對象與理論建構的對照過程更為完整。以本文來說，在擔任輔導老師期間，長期的與在地互動讓作者獲得多次的刺激，得以一再反思「輔導老師」的意義：到底是該站得較遠，做好衝突準備，不顧在地情況，強力要求貫徹參與式預算的原則？還是站得較近，跟在地打成一片，依循既有秩序，避免發生糾紛呢？然而，經過持續的磨合，其間有衝突也有體諒，最後發現兩者皆有利弊，只有折衷，即保持既近既遠的距離，才是輔導老師的最適位置，而這樣的位置需要互動的藝術才能達成，本文即以此重新檢視當時的田野觀察與深度訪談紀錄，試圖與 Simmel 的陌生人概念產生聯繫，並且從輔導經驗中補充 Simmel 僅止於描述陌生人的缺失，進而從社會技能與關係建構的角度，說明成為陌生人的過程。

研究者即為研究對象所產生的助益，可以在既有研究中得到驗證。例如，在 Michael Burawoy 關於資本主義勞動的研究中，如他所言，作為一個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他理所當然地把生產過程連結到階級意識的生成，因此，若他沒有以工人的身分進入工廠，和其他工人一樣地賣力工作，他便無法感受到資本主義將生產體制轉為某種

促進工人賣力表現的隱然秩序，更無法感到「就連我自認是個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也熱情不減、活力充沛地（儘管能力不是很強）投身於『趕工遊戲』之中」（Burawoy 著、林宗弘等譯 2005: 78），換言之，若 Burawoy 只是單純地扮演研究者，而與研究對象的親身經驗分離，他就無法了解受到剝削的工人們為何不反抗，以及資本主義是如何為工人們製造甘願（manufacturing consent）。以國內的研究而言，周佳君（1996: 323）進入工廠擔任工人，以第一人稱敘述「（我）在廠內親身體驗到飲食作息習慣被改造的過程」，從而了解與確認工廠內的輪班生活對於女工生活的影響。因此，本文雖有參與式研究與自傳民族誌的色彩，本文作者親自的「以身為度」，測量「輔導老師」這個角色在參與式預算中的表現、作用與建構，得到更為豐富的資料，對於民主創新的運作、公民社會的形貌，乃至於社會關係的影響與建構，仍具有學術上的意義與貢獻。

如前所述，實證主義強調的客觀性受到其他方法論的挑戰，但本文並不主張全然放棄客觀性的要求，為了讓本文的資料能夠被可信的蒐集與呈現，本文採取以下幾個策略：第一，在資料蒐集的對象上，本文擴大訪談該縣市其他公所審議社造的負責人與文化局人員，這些對象可以從第三者的角度表示他們對於蜈蚣區的看法，由於他們並非直接的利害關係人，因此能夠提出較為客觀的意見，這些受訪者如同鏡子般，可以從他們的角度評估作者的自我展演的過程與結果。<sup>8</sup> 第二，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上，尤其是深度訪談的部分，大多數是在參與式預算執行完畢後才進行，雖然此時作者作為輔導老師的身分的影響減低，研究者的身分較被彰顯，作者仍盡可能壓抑自己輔導老師的身分，強調訪談僅供研究之用，在訪談時，不與研究對象爭辯，避免研究對象在爭辯中感到某種「政治正確」的壓力，而沒有說出他們的想法。第三，在資料分析上，作者恢復研究者的身分，將蒐集到的田野

8 文化局的訪談對象包括小宜、小伶與小麗等業務直接與審議社造有關的人員，對於蜈蚣區的社造歷史與參與式預算運作的情況知之甚詳。其他行政區的受訪者的訪談則只是輔助的角色，用意在於作為蜈蚣區經驗的對照與驗證。



筆記與訪談紀錄視為客觀的資料，並在其中持續檢視與反省同時作為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在分析上可能造成的偏誤。第四，在資料呈現上，為了降低作者刻意選擇有利資料（cherry-picking）的疑慮，本文在使用資料時，強調正反並陳的使用，若田野資料與訪談紀錄對於本文作者有質疑或挑戰，或是作者出現展演失敗的情況，在分析中均不會刻意避免呈現。事實上，呈現這些質疑與挑戰，以及展演失敗的情況，更能突顯本文對於行動者需要透過社會技能與認同工作取得陌生人地位的論點。第五，在本文的書寫上，作者明確指出自己兼具研究者與輔導老師的身分，提供讀者知情閱讀的基礎。

對於客觀性的強調，近來已有許多反思，即便是表面看來最為客觀的自然科學，研究者在進行研究時，也難免受到研究典範（paradigm）的影響（Kuhn 著、程樹德等譯 1994）。社會科學研究更是如此，因為任何一種研究方法，都是在製造某種情境，塑造研究對象的表現（Burawoy 1998; Perrin 2014）。在此反思下，有學者提出反身性的科學觀（reflexive science），在此科學觀下，認為若研究者即為研究對象，不必然危及研究的客觀性，反而認為如此的互為主體性，可以讓研究者更敏銳地觀察情境的影響，並將此觀察延伸到理論的修正與發展（林宗弘 2005；楊弘任 2014: 331-332）。

本文一方面同意研究者作為研究對象的方法論意義與可能產生的理論貢獻，一方面也同意社會科學研究仍應以相對客觀為目標，避免個人價值的過分介入，時時反思本文作者兼具兩種身分可能帶來的問題。透過以上對於客觀性與研究者角色的方法論闡述，以及對於資料的蒐集與分析的說明，相較於強調「程序的客觀性」，即主張研究者與研究對象應區隔的實證主義，本文作者兼具不同身分的參與經驗，為本研究帶來對於田野更多的認識與更堅實的詮釋基礎，在適當的寫作策略與持續的自我反思下，本文的發現反而具備「鑲嵌的客觀性」（embedded objectivity），藉由研究者就是研究對象的設計，進行工匠式的知識生產，指出實證主義之眼可能不及之處，持續地修補既有理論（Burawoy 著、林宗弘等譯 2005: 28；林宗弘 2005）。



## 七、取得陌生人地位的組織者： 輔導老師的角色與展演

提到擔任輔導老師的作者，公所經常表現出曖昧的反應，例如，文化局負責社造業務的主管小宜就提到，「很奇怪，大家明明都很喜歡輔導老師，但是要跟大家約老師前往訪視的時間時，每個又推來推去，希望老師不要來」。2019 年接替安珀與海倫的蜈蚣區公所的新主管與承辦，在某個審查社造計畫的場合遇到作者時，笑著和作者說「我們聽到你要來，我們都嚇死了，因為我們（從安珀和海倫處）聽到你很多恐怖的事！」這些反應意味著對於蜈蚣區，乃至於其他公所來說，輔導老師是一個既親近又遙遠的存在，一方面覺得親近，所以喜歡和輔導老師互動，另一方面又覺得遙遠，不想他來，因為輔導老師總會安排複雜的工作要他們完成，這樣的曖昧感覺，代表作為輔導老師的作者與公所之間的陌生人關係。

作者出身於北部，與蜈蚣區素無瓜葛，可說是蜈蚣區的局外人，若要成為 Simmel 意義下的陌生人，需要藉由本身的社會技能，適時地採取區分性與合併性的展演，並讓他的展演可信，逐步讓他與在地形成既近既遠的感覺。為了與在地保持距離，他使用認同限定與時間性提示的區分機制，在繼續合作的基礎上，特出他與在地的差異。認同限定是作者主要使用的區分策略，安珀和海倫回憶輔導老師第一次到公所時就明確表示「我不是來交朋友的，我是來幫助大家操作參與式預算的」，透過突顯自己的身分與工作內容，在輔導老師的身分與在地之間劃出明確的界線。作者之所以強調其專業輔導者的角色，不想與安珀和海倫變成朋友，是因為擔心朋友關係所帶有的互惠性會讓他無法客觀地規劃與監督參與式預算的運作。因此，在稱謂上，作者也不稱安珀和海倫的名字，而是盡量以職稱相稱，突顯雙方的正式關係，避免陷入朋友關係可能帶來的不公正。

在與該縣市的社造老師互動時，作者會做出一般社造與傳統社造的區隔。文化局的小伶就舉了一個例子，他指出輔導老師曾與該縣市一位社造老師在一場審議社造的成果報告中起過小爭執，這位社造老師從一般社造的觀點，指出審議社造的提案內容與既有社造推動方向不盡相同，但是他卻以審議社造輔導老師的身分，平穩但語帶氣憤地強調，審議社造的精神就是由下到上，讓民眾討論出他們認為對於社區最好的計畫，如果民眾的討論結果輕易地被專家學者否決，不僅民眾會對於參與式預算失去信心與參加的動機，對他的輔導工作造成困難，也不符合社造凝聚社區認同感與公民培力的目標。本文作者的反應，並未引起在場人士，包括那位社造老師的反對，會後，泥鷗區的承辦長工更是來向作者表示，剛剛的話為他們出了口氣。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作者的社會技能發揮，基於對於審議社造與輔導工作的認識，在一個討論未來社造方向的會議中（認知），透過難以被忽視的表達方式（展演），加上作為輔導老師的權威身分（象徵），為審議與社造的結合作出共享的定義，而這個定義是有利於作者在這個議題中獲得影響力，讓作者不只是審議的專家，也是社造的專家，不管是讓其他行動者心悅誠服（如長工），或是有不同意見卻被壓抑（如社造老師），民眾在參與式預算中應具備實質決定權的規則已然建立。

作者在面對蜈蚣區的在地民眾也會特出自己的輔導身分，例如，在蜈蚣區參與式預算的行前討論中，社區民眾請安珀轉達，向輔導老師建議討論的分組可以用社區為單位，一個社區一組，大家彼此比較熟悉，然後每個社區提出方案再進行投票，他則要求維持原有隨機分組的規劃，因為只有隨機分組才能增加討論的異質性，只有異質的討論才能提升社區成員的相互理解與增加創新的可能性。在這次的行前討論，安珀因為社區的壓力，請作者考慮讓每個社區都分到一個方案，作者就表示，如果真的要這樣，就拒絕輔導蜈蚣區，因為分豬肉的政治運作並不符合公民審議的精神。面對安珀嘗試帶回來蜈蚣區習慣的社造邏輯，輔導老師的身分（象徵）讓安珀不得不重視作者的意見，基於對於公民審議的知識（認知）以及對於審議社造與一般政治

的劃界（展演），讓安珀無法進行下去，因為在審議民主的架構下，作者的回應是有道理的，因為具有負面意義的一般政治成為討論的參考點，而讓強調改革的審議社造回到一般的政治邏輯是不正確的做法（Eliasoph and Lichterman 2003）。

除了突出自己的身分外，作者有時會運用時間性提示，利用對於短期目標的強調，讓相關行動者聚焦到自己與在地的不同。除了「我不是來交朋友」，對於公所來說，輔導老師另一句掛在嘴邊的話是「我也沒有很喜歡做這個，反正我就是輔導到今年底」，對於聽眾來說，這句話意味著他只會與在地形成短期的輔導關係。此外，作者將蜈蚣區的參與式預算分為幾個階段，每個階段又有不同的工作要完成，這樣的做法，容易將在地的注意力集中於每個參與式預算短期目標的實現，鞏固了作為輔導老師的角色。作者的時間性提示之所以奏效，當然也與其社會技能有關，由於對於參與式預算操作的經驗（認知）、專家身分的突顯（展演）以及輔導老師的權威（象徵），得以將眾人的焦點集中在參與式預算上。

然而，只是與在地建立遠的關係並不足以取得陌生人的地位，作者還需要藉由普遍性轉移與多重鎖定的合併策略，讓在地感到親近。以普遍性轉移的技巧來說，「我們」經常是作者援引，用來團結他和在地的普遍性認同。輔導老師經常告訴安珀和海倫「我們辦的參與式預算一定要是最好的」，他也告訴社區領袖這次的參與式預算是對「我們」這幾個里很重要的工作，讓大家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意見，讓社區更活絡。透過營造「我們」的感覺，作者得以消除他與在地行動者之間的界線，此時的作者不是一個外來者，而是一個想和大家一起讓蜈蚣區變得更好的人。

作者之所以能彰顯「我們」成功，讓其展演具有說服力，第一個原因是勤於到公所與進入社區，關心各個階段的運作。對於社區來說，作者是他們最常看到的社造老師，無論是作者到社區，或是社區民眾來上作者的課，他們都感到他對於整個審議社造的在意，豐仁社區的里長兼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美女在訪談時就對作者提到，

「（你）上課上到我們連廁所都沒有時間去……你一直講又一直咳，又不喝水，所以你咳一次我就幫你喝一口水」，而這樣的努力更帶動了幾個社區的共同參與。美女說：

因為輔導老師太認真了，要不是因為輔導老師太認真，不然我們也不做了，真的，從二月開始，弄這麼多月，我們幾個里都有人覺得是在搞兒戲，一個案子才四萬塊，乾脆不要做了，我就說不要這樣，因為輔導老師太認真了！

除了蜈蚣區以外，番薯區是另一個當年作者負責輔導的行政區，區長就說「輔導老師是他看過最關心他們公所計畫的老師，因為沒看過老師會一直跟計畫……不能辜負老師」。透過經常造訪公所與社區，並且展現無比的投入，使得公所與社區都感到輔導老師是和他們在同一條船上，之間是沒有隔閡的。

其次是作者的輔導風格，文化局總理社造業務的小伶認為輔導老師並非由上到下地命令公所該怎麼做，而是站在一個較為平等的關係向公所說理，有時他也會接受公所的意見，在參與式預算的規劃上，作出不違背參與式預算精神的調整，至於無法調整的部分，他會解釋原因，並且表示如果按照他的規劃卻做不好，責任由他來負。作者也親自訓練討論的小組主持人與主持行前討論，並且親自主持每個行政區的第一場住民大會，作為示範。相較於社造老師多半是對於公所的社造計畫下指令，這位輔導老師則像是夥伴，一起和公所溝通大家都能接受的結果，讓文化局、公所或社區均感到作者就是在地的一部分。

對於「我們」的強調也帶有多重鎖定的作用，對於公所、社區乃至於社造來說，參與式預算有著不同的意義。對於公所來說，安珀和海倫就認為參與式預算是項負擔，因為公所人力吃緊，他們尚有其他業務，而擾動社區的企圖更是吹皺一池原本平靜的春水，包括原先穩定的社區關係與權力分配；社區領袖則有分歧的看法，有的看成是爭

取政績的方式、有的不願抬轎，而有的想讓社區有活力；社造人士則擔心參與式預算與傳統社造的作法不同，造成兩者的排擠與不協調。面對這樣的情況，作者強調若「我們」能把參與式預算做好，不只是能讓其輔導的工作順利完成，對於公所、社區領袖與社造人士都是好事：對於公所承辦來說，做好可以獲得上級的嘉獎，也對他們負責的社造業務帶來成就感；對於社區領袖來說，參與式預算只要辦好，能讓更多民眾參與，可以解決領袖在擴大社區參與社造事務的難題，而且如果別的社區積極參與，某個社區卻不參加，該社區的領袖的聲望也會受損；對於社造人士來說，如果參與式預算做得好，未來可以向文化部申請更多的社造經費，一起把餅做大是對大家有利的。當「我們」形成之後，屬於我們的共同利益也隨之浮現，透過多重鎖定的策略，作者讓參與式預算對於不同行動者有著相同意義，而自己與其他行動者並無差異。與區分性展演相同，在適當的社會技能的支撐下，讓展演產生效果，否則就可能變成拙劣的演出者，即便採取了區分性與合併性的展演形式，卻達不到說服觀眾的結果。

透過區分性與合併性的同時展演，加上作者的社會技能，能夠用適當的展演方式，說出讓人不能忽略而且有說服力的話，因而成為蜈蚣區的陌生人，使得他能夠發揮陌生人的優勢，運作蜈蚣區的參與式預算。首先，陌生人的地位有助於作者接觸與說服原先對於參與式預算興趣缺缺的同仁社區，使得他們改變態度也變得願意參與。同仁社區的領袖阿龍在接受作者訪談時，被問及在這次的參與式預算中印象最深刻的人，他酸酸地回答「就是輔導老師啊，就是你啊，講話很會講」，即便他認為住民大會的分組應以社區為單位，由社區領袖做提案人，並保障每個社區都應該分到相同金額的預算，對於作者的某些作法不表同意，但是作者具備的陌生人特質，讓他在對阿龍說明參與式預算的精神以及為什麼他的設計符合這樣的精神後，阿龍雖然心裡不服，卻因為陌生人地位賦予的公正性，使他說不過作者，也只好在表面上同意，並且在某種程度上參與。

陌生人地位所伴隨的客觀性，則讓作者可以化解社區對於這次參



與式預算公平性的擔憂，例如，水州里長阿水就曾在一次說明會後，向輔導老師表示他的里是最小的，如果投票的話，對他的里一定是不利的，會造成不公平，輔導老師則以過去輔導的經驗，一方面指出對於每個社區的一視同仁，一方面則向阿水說明投票規則，向阿水保證絕不會出現大吃小的情況，方案是否通過，還是要看計畫的品質，而非里的大小，他向阿水表示，投票要投四票，而且四票都要投完才會算有效票，目的就是鼓勵民眾除了支持自己的方案外，也要思考其他方案的重要性，藉由對於自己輔導老師身分的提示並且提出讓人信服的理由來處理阿水的擔憂。

由於取得了陌生人地位，作者可以更全面與不偏誤地規劃參與式預算的進行，不需理會來自特定團體與行動者有形或無形的壓力。在宣傳上，除了爭取社區領袖的支持以外，輔導老師要求公所針對這幾個里的家戶派送兩次的宣傳海報，並在蜈蚣區的公共場所宣傳，繞過社區領袖，直接讓更多民眾知道參與式預算的消息，參與住民大會與公民投票。在住民大會上，他要求召開兩場大會，每場約 60 人，增加民眾參與的可能性。住民大會的分組以隨機為原則，並禁止民眾自由換組，目的在於增加討論的異質性，讓不同里的民眾可以了解彼此的想法，並作出符合每個里的利益的提案，避免讓參與式預算成為里與里之間的戰爭。輔導老師另外要求住民大會的時間必須在周末，讓大多數人都有機會參與，在地點的部分，他要求在涵蓋這幾個里的小學進行，避免選擇任何里長辦公室或是社區發展活動中心，以免無形的社會界線造成不同社區的動員差異。在公民投票上，他主張設置複數投票地點，以這幾個里共享的地點為優先，例如作為這幾個里的信仰中心的廟宇，讓大家以更為公共的認同參與，避免侷限於狹隘的鄰里意識，有利於共善結果的形成，並且不可設置在特定的里辦公室或社區發展協會，確保投票的公正性。另外設定高的投票比率，稀釋社區領袖的動員力量，投票則是投複數票，而且一定要投完，否則就算廢票，降低人為操作的機會，並增加投票結果的不可預期性。

最後，參與式預算的過程在某種程度上為這幾個里創造出一個較



大的集體認同，如豐仁社區的美女所說，這幾個在蜈蚣區農村區域的里，因為參與式預算的推動，開始被外界稱為「農村蜈蚣」，現在人家都叫他「農村蜈蚣的水姑娘」，即便是對於過程有些微詞的阿龍，在談話中也不時提到「農村蜈蚣」。「農村蜈蚣」超越了個別社區，形成更具包容性的集體認同，這固然與這幾個里在參與式預算中的磨合有關，但是正如 Simmel 所言，透過作為陌生人的作者的居中協調，更有可能團結原先較為分立的社區。

從結果來看，蜈蚣區在這次參與式預算的表現相當不錯。就參與的規模來說，第一次舉辦就有接近 120 位的民眾參加住民大會，有超過 800 位民眾參與公民投票。就區域範圍來說，雖然只有幾個里，但相較於世界或台灣其他縣市的經驗，這樣的參與情況可說是名列前茅。<sup>9</sup> 預算的分配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雪中送炭而非錦上添花，因為獲得第一高票的方案竟然是人口最少、老化最嚴重的水州社區，美女說水洲社區頂多只有 30 位居民出來投票，阿水更說，社區只有他一部車，年長者投票還得靠他來來回回的載，所以也載不了多少居民出來。阿水認為，這樣的結果某種程度是因為他從整體的角度提案，告訴大家雖然建設是在水州社區，卻是對各個里的居民都有幫助。蜈蚣區公所甚至還整合獲選的第二與第三案，向中央政府申請經費，因為有公民審議的基礎，獲得超過千萬的經費補助。當然，獲得這樣的成果並非全是作者的功勞，但是如果作者沒有取得陌生人的地位，民眾的參與、社區的合作、預算的重分配，乃至於包容性認同的形成，可能就不會發生。安珀和海倫的對照經驗，正好可以說明當參與式預算的組織者無法成為陌生人時會面臨的困境。

---

9 這裡要說明的是，蜈蚣區參與式預算的投票標準很寬，只要年滿 16 歲以上即符合資格，因此，這些參與投票的民眾不見得全都住在這個區域，但是由於這幾個里的封閉性，絕大多數的投票民眾仍是以這個區域的居民為大宗。

## 八、陷入在地人困境的組織者： 安珀和海倫

在輔導老師正式到蜈蚣區與公所討論參與式預算的規畫前，安珀和海倫就事先按照過去的慣例，在社造領袖會議中，邀請他們熟悉的里長與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詢問他們誰有意願參與。會中有兩位表達參與的意願，一位是蜈蚣區最大的全東社區的里長，一位則是豐仁社區的美女，由於豐仁社區較為偏遠，所以全東社區就禮讓給豐仁社區，美女在感謝之餘，表示她想要邀請豐仁社區周邊的幾個社區一起參與，雖然這幾個社區並未有代表出席這次的會議。美女的這個決定，讓安珀和海倫捲入這幾個社區的紛擾。

因為美女希望讓豐仁社區鄰近的幾個社區一同加入，安珀和海倫於是另外邀請這幾個社區的地方頭人，包括里長與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與總幹事，召開一次「萊姆樹」會議。在會議中，先由輔導老師介紹什麼是參與式預算，接著由美女報告她在社造會議的決定，並且希望其他社區能配合。美女話一說完，全場陷入詭譎的氣氛，雖然沒有明著反對，社區領袖卻都語帶酸意的回應。安珀回憶當時的情況：

那天美女跟大家說她很勇敢地承擔參與式預算的責任，還說本來水州與火丁都沒有機會，可是因為她要把豐仁旁邊幾個里納進來，要一起，不能漏了你們。可是事實上不是這樣啊，我們也不能當場打臉她，後來火丁的里長也不高興了，就說給你做就好，就給你做……火丁的總幹事也不高興，但是心裡想就算了，反正他們不缺這個案子……氣氛真的很怪。會議結束後，我就跟同事說，我們今年應該會蠻難過的……。

除了火丁的里長外，同仁的阿龍也酸酸地回應，「就妳主導，我們都配合啦！」水州的阿水，雖然沒有明白抱怨，卻也在訪談中表示地方上有人抱怨不知道最初社造會議消息，沒有參與其中，後來卻變成是半強迫的參與，他認為這樣的過程傷害地方上的人際關係，對於社區之間的互動有不好的影響。安珀和海倫因為不想得罪美女，卻讓其他未經詢問的社區感到不公正，是公所半推半就地讓他們加入。

除了感到不受尊重而不高興以外，其他的地方領袖認為美女的舉動有其政治野心。安珀分析道：

豐仁這個里長兼理事長什麼都想做，想表現，想很快被看見，她還從社會局那兒，將豐仁社區變成社區關懷據點，還想結合參與式預算的成果，一起揭牌與公布……為什麼要這樣做，因為明年就要選舉了！

受到美女的政治舉動首當其衝的就是阿龍了，因為地方盛傳政府將重新調整這個區域的鄰里，可能會讓豐仁和同仁合併，阿龍的連任勢必受到影響。更複雜的是，美女與阿龍是姊弟關係，他也不好明白反對美女的意見。如同海倫指出，阿龍並不想參加這次的參與式預算，但是因為選舉需要與家族牽絆，他只好消極地參與。

從社造會議到萊姆樹會議，安珀和海倫所具備的社會技能讓他們深深地陷入在地的糾葛。因為社造會議沒有受到邀請，有的社區領袖開始懷疑公所與這次參與式預算的計畫是不是特別偏袒美女，美女也開始認為這次的參與式預算是她爭取而來，對於公所提出更多的要求。相較於作者透過展演，維持陌生人的地位，在地承辦安珀和海倫在面對這些來自社區領袖的壓力時，則是根據過往的社造經驗，選擇儘量配合社區領袖的要求，而非如作者選擇與在地保持一定的社會距離。第一個例子是能夠獲得預算的方案數量，如同本文前述，安珀向輔導老師建議是否讓每個社區領袖都得到一案，化解領袖們彼此人際上與政治上的面子之爭。第二個例子則是公民投票的地點選擇，雖然

從地理位置上看，某個廟宇是最適合作為投票場所，卻因為阿龍的反對，只好移到另一個地點。第三個例子則是當安珀發現參與式預算成為社區領袖間的競爭，包容性降低時，覺得不妥，她透過私下邀請的方式，找一些學生來參加，希望稀釋社區領袖的影響力，此舉卻又引起社區領袖的不滿，認為外地人怎麼可以決定在地的事。到頭來安珀和海倫集中於合併性展演的作法，並未解除社區間的緊張氣氛，因為他們無法面面俱到，順了嫂意，卻很容易就逆了姑意，更因此無法從整體的角度，對於參與式預算提出最佳的規劃。

總結來說，安珀和海倫的組織策略始終是向在地傾斜，無法突出本身作為一個超然組織者的角色。這樣的結果，固然一部分來自於他們與地方的強力連結，使他們較容易陷入在地的泥淖，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安珀和海倫缺乏足夠的社會技能，讓他們能夠突顯遠的社會關係。在認知層面上，他們缺乏對於參與式預算足夠的知識與經驗，可以化解社區領袖的疑慮，反而將審議社造看成是原來社造的擴大，以過去的社造經驗經營參與式預算，在展演層面上，如同海倫指出「公所主管就是很在乎里長和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的反應」，降低他們維護參與式預算原意的動機，而以安撫社區領袖為主要策略，在象徵層面上，他們公所承辦的職務較難讓他們對於社區領袖具有直接的影響力。因此，他們始終無法突出自己作為參與式預算組織者的身分，採取合併性的展演勝過區隔性的展演，而被社區領袖視為在地的公所人員。如同安珀在參與式預算結束後的訪談中提到，由於他們過於擔憂參與的狀況，在活動尚未正式起跑前，就使用動員社區領袖的慣常策略，「現在回想起來，我從第一步就走錯，第一步走錯就是開了那場會，就是把頭人都找來的那場會，回想起來，我不應該那樣操作」。換句話說，最初的社區領袖會議造成某種難以建立陌生人地位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效應，當組織者在一開始就過於依賴社區領袖時，便會讓後續想重建陌生人地位的嘗試變得困難重重。

## 九、討論

參與式預算作為一種創新的民主實作，希望透過有效的參與，重拾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進而達成深化民主與茁壯公民社會的目標。正因有此期待，參與式預算的運作與結果就成為學者與實作者急於了解的對象。相較於將民主實作視為客觀因素的產物，本文從社會關係的角度，說明民主實作是如何被行動者透過互動所建構。行動者如何定義彼此的關係，影響公眾對於民主的想像，即便是面對相同的客觀條件，不同的社會關係會讓行動者對於這些條件有著不同的詮釋，賦予民主不同的意義，進而產生不同的實作（Mansbridge 1980; Emirbayer and Sheller 1999; Polleta 2004; Mische 2007; Perrin 2014; 林祐聖、陳東升 2018）。相較於既有研究著重於參與者的部分，本文把焦點轉向參與式預算的組織者，這個對於參與式預算的全盤規劃有著重大影響，但是並未獲得充分關注的角色。運用 Simmel 的陌生人分析，本文發現，若組織者能與在地行動者建立與維持「遠」和「近」的感覺同時並存的社會關係時，較能形成充分動員、公正運作與促進合作的參與式預算。以下對於本文的發現進行討論。

### （一）社會關係與公民審議

社會關係與公民審議的連結並非本文的創見，學者早已注意到兩者的關係，並且指出朋友關係是較能讓強調平等、開放、互惠與合作的審議順利運作的關係類型（Mansbridge 1980; Polletta 2004; 林祐聖 2012）。然而，當我們把距離拉遠，我們發現參與式預算的工作也不僅只有狹義的審議本身，還包括前端的動員與制度設計、中間的公民討論與投票與尾端的方案執行，因此，與參與式預算相關的行動者不僅只有審議的參與者，還包括總管參與式預算各項安排的組織者。

本文認為，因為任務的不同，組織者必須與在地行動者建立不同性質的社會關係。當公民審議的參與者界定彼此為朋友時，會讓理想



的公民審議水到渠成。然而，從本文的發現來看，若公民審議的組織者與相關行動者形成朋友關係，反而會不利於公民審議的運作：朋友關係限制了組織者的網絡規模，容易造成動員的偏誤；朋友關係的互惠性質讓組織者難以建立公正的規則與安排，因為組織者必須關心朋友的感受；朋友關係的排外性質則容易讓非朋友對於公民審議的公正性感到懷疑（Polletta 2004）。<sup>10</sup> 因此，既然社會互動不可避免地受到社會關係的影響，本文認為，在參與式預算中，組織者的角色應當要與相關行動者保持 Simmel 的陌生人關係，與其他行動者保持一個既近既遠的社會距離，如此才能讓參與式預算順利運作。

公民審議的運作經常因為組織者的身分而遭遇公正性的質疑，若是由政府發動，經常有民間團體質疑是否為政策護航，有的社會運動團體會避免參加，以免替政府背書（陳東升 2006；林國明 2013；Polletta 2016）；若是由民間團體主辦，又容易被政府質疑討論的不偏性與參與者的多元性，或是引起敵對團體的消極抵制或積極反對（杜文苓 2007: 86），以倡議團體為主體的審議更是容易被懷疑結論是先射箭再畫靶，策略性地運用公民審議達到它們的目標。<sup>11</sup> 面對這些問題，有些人寄望於公民素養的提升，有些人寄望制度的重新設計，有些人則寄望於政府部門釋出更多的善意，包括開放更多資訊與提升審議結果的實質作用。然而，公民審議總是由人在操作，其過程是由無數的社會互動所構成，公正性不會是客觀的存在，而是需要陌生人地位的組織者讓相關行動者，包括政府、社會團體與個別民眾相信公正性的確存在，才能進一步提升參與的數量與討論的品質，也才能進一步提升審議結果的正當性與實質影響力，讓公民審議的發展

10 Francesca Polletta (2004: 153-154) 指出，朋友關係有利於參與式民主的運作，第一，朋友之間是平等與關心對方的，第二，朋友關係是自願性的，不存在對於朋友關係的明文規定，因此利於行動者透過開放性討論尋求共識。然而，朋友關係尚有其他負面特性，第一，朋友關係是排外的與小規模的，朋友關係會做出朋友與非朋友的區分，而行動者受限於時間，也不可能有太多朋友；第二，朋友網絡的增補經常是同質的，因為新成員多半是朋友的朋友；第三，朋友關係帶有強烈的義務與情感，因此，若發生衝突或背叛，經常會引發強烈的情緒反應，導致友誼的瓦解。

11 本文要提醒讀者，公民審議對於不同的行動者有不同的意義，從社會運動角度來說，多一項能凝聚運動成員與達到目標的武器當然是件再好也不過的事（Carson 2001）。

進入良性的循環，而非許多以審議民主為號召的民主實踐，因為實作上不停地遭遇挫折，讓社會失去對於審議民主落實在日常生活的信心。<sup>12</sup>

## （二）「陌生人」的社會建構性

除了將 Simmel 的陌生人應用於參與式預算的運作，說明陌生人關係對於參與式預算的組織者的重要性，本文也從關係建構的角度，拓展陌生人此一原先以描述為主的概念，指出陌生人關係並非與生俱來的歸屬地位（ascribed status），而是行動者透過社會技能的運用所取得的成就地位（achieved status），組織者必須技巧性地透過區分性與合併性的展演，讓在地對於組織者產生遠近關係同時並存的感覺，成為參與式預算中的陌生人。換句話說，陌生人並非本質性的產物，組織者的背景固然影響陌生人地位的取得難度，但是特定背景不能和陌生人地位畫上等號。以本文作者為例，他之於蜈蚣區如同白紙般的背景、對於參與式預算理論與實務的理解以及「輔導老師」和「大學教授」的象徵，使得他具備有利於建立陌生人關係的社會技能，但如同 Goffman（1959）所指出，任何展演都冒著支離破碎的風險，當展演出了差錯時，在地人同樣會質疑其公正性與客觀性。例如，為了向安珀和海倫示範如何主持住民大會，作者親自上場主持了三個多小時，在大會尾聲的投票時，因有兩個案子的內容很接近，他於是詢問在場民眾要不要併案，而在此階段作者犯下的失誤，幾乎使他陷入展演陌生人失敗的危機。在民眾同意併案後，作者表示這兩個案子的票會加在一起，但是這個做法不僅失去併案的精神，也容易造成票數的不公。<sup>13</sup> 這個失誤引來阿水的嚴重抗議，即便立刻更正，阿水的情

12 杜文苓（2007：86-87）的研究深刻地描述公民審議的組織者和參與者對於審議結果不被重視的失望，加上舉辦公民審議必須付出非常多的心力，容易打擊大家對於公民審議的信心。

13 作者當時口誤，表示每位民眾可對於這兩個案子各投一票，然後再合併計算票數，這樣的作法其實會造成票數的不當增加，而對於其他案子不公平，正確的作法應該是讓兩個案子併為一案，而每位民眾對於這個合併後的案子只能投一票，如此才能維持每個案子的公平競爭。

緒仍有些激動，認為小里的權利受到傷害；在作者公開道歉與說明之後，加上過往營造的陌生人表現，阿水回歸到原來與作者互動的陌生人模式。這個插曲證明陌生人的地位並不是本質性的，而是需要適當的展演才能產生，即使作者的非在地人與輔導老師的身分，讓他有著展演陌生人的優勢，但當他認知失誤，展演失敗，無法讓相關行動者相信其公正性時，他的陌生人地位即隨之受到威脅。

區分性與合併性的認同工作是建立與維持陌生人關係的策略，但組織者完成這兩項工作的難度，會因為其個人能力與面對的環境而有所差異。個人能力如何影響陌生人關係的建構將於下節關於理想的組織者一併討論，本節著重於環境的部分。就環境而言，場域內的邏輯、身分重疊程度與互動風格是三個需要考慮的因素。以場域邏輯來說，若該場所所習慣的理念與世界觀和參與式預算相距甚遠，合併性的展演就會變得困難，因為能夠普遍涵蓋的身分難以建立，或是過於抽象而失去動員力量（Friedman and McAdam 1992）。<sup>14</sup> 就區分性展演來說，在此情況下，組織者固然容易特出自己的身分，但是卻不容易在特出的情況下依然維持與其他行動者的合作（Mische 2003）。如果該場域的集體認同是排外的，使得場域的行動者與組織者的身分重疊程度低，組織者就難以尋找包容性的認同，和他們建立在同一條船上的關係，容易成為徹底的局外人（Mische 2003）。最後，場域中的討論規則與互動風格會限制什麼樣的議題會被提出、什麼樣的解決方式應該被提出以及應該用什麼方式參與討論，因此，若該場域習慣關注離家近的事，提出由私人取向的解決方式，並且限制行動者以冷靜的態度參與，公民參與甚至難以成為議題，即便成為議題，也會因為無法表現出熱情與鼓舞，而使組織者的展演效果降低（Eliasoph 1996; 1998; Eliasoph and Lichterman 2003）。

---

14 從社會運動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其他的例子，例如，若想說服進步型的女性運動採取官僚制的組織方式就非常困難，因為此類運動框架把平等與扁平的組織形式視為理所當然，或是以此作為區分他們與父權組織的界線。

### （三）理想中的參與式預算組織者

從對於陌生人關係的強調，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誰比較適合作為參與式預算的組織者，使一場符合原意的參與式預算乃至於其他的審議論壇成為可能。

首先要考慮的是組織者與在地的關係，在參與式預算中，如何增加民眾的參與是重要的工作，因此讓熟稔在地的行動者或團體成為組織者似乎是合理的選擇。許多學者與實作者也強調社會團體的重要地位，因為他們了解在地，具備動員的基本盤，可以減少動員的壓力與不確定性。然而，如同本文指出，與在地熟稔固然能帶來某些程度的參與，但是更容易因為過分鑲嵌於在地，反而冒著動員的不全面、過程的被質疑與結果不合法的風險。熟稔在地的組織者固然可以利用他的社會技能，建立和維持他的陌生人地位，但是如同蜈蚣區的經驗，從熟悉在地到成為在地的陌生人是十分困難的，而從不熟悉在地到成為在地的陌生人反而相對容易。

其次要思考的是組織者的社會技能，包括組織者應具備的技能內容為何。在認知面上，從本文的案例來看，對於參與式預算理論的熟稔與充分的實作經驗，比對於在地的認識來得重要，一來可以讓組織者能順利區隔性與合併性的認同工作，無形中也提升組織者在象徵面的力量，二來讓組織者能夠自然的跳脫以在地邏輯理解參與式預算。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作者能夠在社造會議中，區隔公民審議與一般社造的差異，但是又能說服大家辦好一場參與式預算是對大家都好的事，化解與在地的差異。在社造中有豐富經驗的蜈蚣區承辦則因為缺乏對於參與式預算的了解，從一開始就以一般社造的慣習來安排參與式預算的過程，在過程中也是以滿足社區領袖為主要策略，因而無法將自身與在地區隔開來。

在展演面上，組織者需要採取適當的方式，在不同的情境中，讓他的話能被重視與接受，在成為陌生人的過程裡，衝突與合作是組織者必要的手段，組織者不能只靠衝突，因為這無法完成合併性的認同工作，也不能只靠合作，因為這無法將自身與在地區隔開來。在本文

中，作者因為沒有在地的包袱，在兩種展演上顯得較為自在，而安珀和海倫卻因為與地方的深厚關係，讓他們不願也不太敢與在地方發生衝突，也就無法區隔他們與社區的關係。

在象徵面上，這意味著組織者能正當的貫徹意志，也比較不會讓自己的意見成為聽眾的耳邊風。如同前述，某些社會位置具有這樣的象徵權力，如本文作者的「大學教授」、「輔導老師」等身分便具有這樣的效果，而安珀和海倫的公所承辦身分，不僅在地位上與社區領袖相當，甚至被認為應為後者服務，加上她們多次表示擔心社區領袖向區長投訴，造成她們的麻煩，因而在結構上就是處於一個不利的位置。<sup>15</sup>

第三個要考量的因素是組織者的動機，組織者必須是個懷抱強大動機，想建立陌生人關係的行動者，無論是什麼原因，像是依賴特定社區領袖或是單純的害怕，若組織者想成為陌生人的動機微弱或甚至是零，他的展演只會是蜻蜓點水，無法發揮作用（Ganz 2000；林祐聖 2018）。一方面他要願意糾正在地對於參與式預算不正確的認知與使用，才能保障預算的分配符合預期的結果，一方面他要表現出對於參與式預算各個階段的關心，如此才能帶動民眾參與。來自外地的組織者即使懷抱強大的動機，也可能因為不好的經驗而改採寬鬆的標準，遑論與在地緊密連結的輔導者，想要維持強大的動機，更是困難重重。以蜈蚣區來說，安珀和海倫一方面擔心社區領袖會向區長投訴，一方面把參與式預算看成一項社造業務，只求不要增加太多的工作負擔，能平安下庄，不要破壞與社區的關係就好，因此不易形成積極介入的動機，僅按照社區的意思操作，或是小規模的執行，都是可能的結果。

雖然本研究以本文作者作為取得陌生人地位的例子，對照無法

---

15 以社區發展協會為例，向文化部系統提出計畫申請固然是它們取得經費的方式，但是它們其實還可以向其他單位申請經費。因此，社區領袖不見得需要買文化部系統的帳，在實務上，經常可以聽到社區領袖抱怨文化部系統對於計畫的要求頗多，經費卻不多，因此轉向農再、樂齡或是長照等單位申請經費，公所的社造承辦甚至需要拜託社區領袖提社造案。



取得此一地位的公所承辦，本文要提醒讀者陌生人地位應視為連續體，而非全有全無的問題。以本文前述，有些公所雖然會考量在地的情況，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不像蜈蚣區般經常糾結於社區領袖的意見，如古龍區就能夠抵抗里長想將票箱設在里辦公室的建議，不須本文作者親自向里長說明。之所以有此差異，從社會技能的角度來推論，雖然在象徵面上兩者並無太大差異，但在認知面上，古龍區的承辦比蜈蚣區更早就接觸公民審議與參與式預算的概念，在展演面上，特別是社造的風格上，他們的慣習是較為以公事公辦的風格進行，在其他社造業務上不見得完全迎合社區，更重要的或許是動機，古龍區承辦對於之前沒有妥善操作公民審議感到抱歉，所以更努力地依照參與式預算的原理與原則規劃古龍區的參與式預算。未來可以觀察社會技能總和的轉變，如何影響蜈蚣區與古龍區的承辦，在陌生人連續體上的移動，以及這樣的移動如何影響參與式預算的進行與結果，不僅可以再次檢驗本文的論點，也可以指出改變社會技能總和的因素，為日後組織者的訓練提供指引。

#### （四）推動審議論壇的策略

根據本文的發現，可以提出三個推動參與式預算以及其他審議論壇的策略。首先是組織者的選擇，本文建議選擇非在地的行動者或團體擔任組織者，再由在地的行動者與團體扮演協助的角色，是比較好的做法。除了審議社造的輔導老師制度外，外包制度也可能是有利於營造陌生人關係的另一種作法，如同海倫在訪談中提到，只有將參與式預算的運作交給不熟悉地方的團體，才可以避開在地的糾葛。<sup>16</sup> 此外，目前有些公所在主持住民大會時，會交換主持的工作，由甲公所

16 外包制度對於台灣參與式預算的負面影響已有學者討論，例如 Poe Yu-ze Wan (2018) 就指出過於依賴外包，使得參與式預算對於政府內部造成負面影響，無法帶來政府革新。本文同意以上的觀點，但是也強調成功的參與式預算絕非單靠外包與否就可以達成，還需要配合其他的因素。換句話說，雖然本文認為外包制度有利於陌生人關係的建立，但是這樣的優勢是否能轉為事實，仍受到客觀環境與外包團體的社會技能的影響。

的員工主持乙公所的公民討論，由乙公所的員工主持甲公所的住民大會，避免主持人受到在地的影響，若能將此種作法提升到組織者的層次，也可製造取得陌生人地位的有利條件。當然，本文不擬宣稱以上的組織者類型必然能夠造成全面參與、過程公正與社區合作的參與式預算，如果這些類型的組織者缺乏營造陌生人關係的動機與能力，或是環境非常不利於陌生人關係的建立，還是可能重蹈熟悉在地的組織者的覆轍。但如同前段指出，相較於從在地人轉為陌生人，從非在地人轉為陌生人是較為容易的，以上三種類型的組織者在取得陌生人的地位時，仍能夠站在先發制人的位置。

其次，雖然蜈蚣區的經驗顯示來自外地的組織者比在地的組織者站在一個更好的戰略位置，本文並不認為在地組織者永遠無法取得陌生人的位置。若是給予他們適當的理論與實作課程，更多的實地觀摩機會，更多的操作經驗，更多的誘因，以及較具權威的位置，仍能加強他們成為陌生人的社會技能，得以建構陌生人關係。

最後，無論是何種類型的組織者，在動員上，本文建議都應該選擇能普遍與直接接觸個人的策略，避免依賴特定社區領袖，讓在地人相信組織者是秉持公平公正的。以新北市身心障礙者的參與式預算為例，主辦單位便以郵寄的方式直接聯繫身心障礙者，鄰里長或是非營利團體雖然也是宣傳的對象，卻僅止於宣傳，不會對他們有任何承諾（葉欣怡、林祐聖 2017）。此外，參加者應以個人身分而非團體代表的身分參與，雖然有研究指出社團的活躍份子願意轉換自己的偏好，和立場不同的人形成共識（林國明 2016），但是從實務來看，參與者一旦以團體代表自居，便會產生團體利益與立場的包袱，讓他不易改變自己的想法。<sup>17</sup> 如同蜈蚣區的例子，以社團為主的動員，很可能會形成不同團體領袖之間的競爭而非合作，就是在這樣

---

17 林國明的研究是以問卷與訪談為資料來源，問卷與訪談本身就是一種情境，研究對象可能會預想政治正確的回應或是研究者想要的答案。為了減低這樣的情況出現，研究者可以比較研究對象在不同情境中的表現，避免讓研究停留在表面價值（Eliasoph 1996; 1998）。例如，學者發現，口頭上表示自己沒有種族歧視，願意雇用黑人的雇主，在實際上雇用黑人的比例卻是低的（Pager 2003）。

的考量下，最早採取參與式預算的巴西愉港強調個人性而非團體性的參與，而美國芝加哥議員 Joe Moore 所發起的參與式預算，也因為結合特定鄰里組織，而引來其他居民綁樁與不公正的批評（Ganuza and Baiocchi 2012; Baiocchi and Ganuza 2016）。

### （五）權威、認同工作與社會技能

本文透過比較身為輔導老師的作者與公所承辦在同一個環境下的展演與結果，說明陌生人關係的地位取得對於參與式預算運作產生何種影響，這樣的設計固然能讓因果關係更為清楚，卻也會讓讀者產生作者之所以能夠組織一個運作良好的參與式預算，並非是他之於社區的陌生人性質，而是因為「他是一位由文化部派遣到地方輔導參與式預算的北部大學老師」的印象，換言之，是輔導老師這個身分所具備的權威性，讓在地民眾理所當然或是心生畏懼地接受輔導老師的規劃，讓蜈蚣區的參與式預算得以順利完成。本文首先要說明文化部並未賦予輔導老師對地方有絕對支配權，然而，本文也同意，即便文化部並未明文規定輔導老師與地方的從屬關係，一位由文化部派來，並在大學任教的輔導老師，這樣的身分還是很可能讓本文作者在非正式的層面上獲得權威。

對於這個疑問，本文強調溝通對於權力施展的重要性。權力意味著意志的貫徹，有權力的行動者可以要求其他行動者按照他的意志作為，然而，權力的行使並非發生於社會真空之中，而需要透過溝通，如同 Goffman 所言，「任何一種權力，都需要以能夠展示它的有效手段作為外衣，而權力會因為它如何被戲劇化（dramatized）而產生不同的效果……就算是最為客觀的赤裸權力形式，如對於身體的威脅，也非表面上的客觀或赤裸權力，而是能夠說服觀眾的展演，權力的施展經常需要借助溝通，而非只是單純的行動」（Goffman 1959: 241）。也就是說，當一個有權力者要施展權力時，他必須表演出他權力優越的地位，他必須讓被命令者了解他的命令，他也要讓被命令者知道不遵守命令的後果。權威的行使更是如此，作為具正當性的權

力，行動者更需要透過溝通，說服被命令者相信遵守他的命令是應當的；反之，若行動者無法說服被命令者，他的權威便隨之下降，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的論述正是這樣的例子：民眾不須服從造成不正義的政府，即便政府是合法產生的。

既然溝通是權力行使的要件，那麼社會技能與認同工作對於權力行使的重要性便不難理解。首先，社會技能與認同工作有助於行動者在社會關係上取得優勢的地位。以蜈蚣區的案例來說，陌生人的地位讓作者獲得權威的位置，讓在地接受其參與式預算的理念，而這個位置的取得並非理所當然，而是因為其社會技能能夠讓區隔性與合併性的認同工作被成功的完成，若是作者無法將其與在地的關係轉為陌生人關係，就很可能無法要求社區領袖或公所承辦遵守作者的要求。

其次，即便行動者取得權威的位置，他依然需要透過溝通，說服被命令者相信他的命令是正當的，沒有超出應有的範圍。我們可以想見，若作者的要求被公所承辦與社區領袖認為已逾越輔導老師的範圍時，他的權威性便不復存在。換句話說，若行動者希望取得權威，他需要運用社會技能與認同工作，定義在這個情境中何謂「正當」的命令以及何謂「正當」的社會關係。以前述本文作者受到阿水的質疑為例，雖然輔導老師對阿水來說是具有權威的，但當他在主持上無法表現出令阿水信服的展演，他的命令超出了「正當」的範圍時，即使他仍是一個「由文化部派遣到地方輔導參與式預算的北部大學老師」，他一樣無法貫徹意志，反而須接受阿水的抗議，調整原來的做法。

第三，除了取得權威與施展權威外，社會技能與認同工作是行動者維持權威所不可或缺的。場域秩序是場域中懷有不同利益的行動者的最重要資源，誰掌握了場域秩序的詮釋權，誰就可以貫徹其利益，因此，權威者即便在最初成功地定義了場域，成為了場域中的既得利益者（incumbent），懷抱不同利益的行動者仍會扮演挑戰者（challenger）的角色，試著重新定調場域中的秩序（Fligstein 2001; Fligstein and McAdam 2012）。為了維持權威性，權威者需要透過社會技能與認同工作，持續說服或壓制其他行動者，讓他們接受既有的

場域秩序與社會關係。面對安珀想要讓每個社區都分到相同的預算，如果作者無法運用其社會技能，堅持與在地的陌生人關係，反而變成在地的一員時，就很可能失去其權威性，因為場域的世界觀與遊戲規則已經回復到傳統社造的邏輯，而作為在地的一員，作者自然需要服從這樣的邏輯。在此邏輯下，權威轉移到擁有豐富社造知識與經驗的社區領袖與公所承辦，所謂「象牙塔裡的學者」或是「雲端學者」的標籤，都在說明在某些場域中，大學教授不必然比在地實作者更具有權威性，強調在地知識的社造更是如此。參與式預算也會因為邏輯的改變，而容易被理解為社區領袖爭取資源的管道，而非平等、廣泛與論理的審議論壇（林祐聖、陳東升 2018）。

第四，除了消極地讓行動者維持權威，社會技能與認同工作更能積極地擴大其權威。藉由對於既存場域秩序與社會關係的重新定義，行動者可以造成框架整隊（frame alignment）的效果，讓原先不屬於其權威範疇的事務，透過框架的橋接、增強、擴張與轉換，可以擴大行動者能夠行使權威的「正當」範圍（Snow et al. 1997），例如讓更多互動被鑲嵌在陌生人關係上。以本文為例，作者一方面藉由區隔性展演，突出公民審議的原則（如前述與社造老師的言語交鋒），確認審議與社造的差異，得以保留其在審議領域的權威性，不至於因接受社造的標準而喪失，一方面透過合併性展演，如多重鎖定的策略，告訴在地公民審議對於社造的幫助，使得社造與公民審議兩個原先分立的概念連接在一起，擴大其權威性，不僅在審議社造的領域，對於其他類型的社造也能產生實質影響。

雖然溝通是權力與權威行使不可或缺的過程，本文同意「大學教授」與「輔導老師」的身分有利於陌生人關係的建構。Goffman 指出，「如果行動者缺乏一個能做出示範、交流與懲罰等方法的地位，那麼，即使他有能力表現出情境定義，也不會有多少用處」（Goffman 1959: 241），從此一觀點，我們可以將權威性的身分歸類在象徵面的社會技能，因為這樣的地位就像放大器或擴音機般，具備議題設定的效果，讓其他的行動者不會也不能忽視他的展演，讓他



較有機會定義情境與彰顯特定社會關係。既有觀察就指出，一些由青年朋友承辦的參與式預算就因為他們缺乏權威的身分，使得他們的意見不會得到在地人士重視，也就難以造成實質的影響（林祐聖 2018），而作者所具備的輔導老師的身分，則讓其他行動者較難忽略其聲音。換言之，本文同意權威身分的重要性，但是，權威身分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權威身分對於溝通的影響，而非帶來本質性的權威。更有甚者，權威身分可能是個雙面刃，因為行動者不恰當的展演也難以被忽略，同樣以阿水在住民大會質疑作者為例，如果不具備輔導老師的身分，作者不適當的認知與展演或許就不會被放到檯面上，也就不會受到阿水的挑戰。

將權威、社會技能與認同工作結合，我們可以避免機械式的權威觀，而以更為關係性的觀點思考權威在場域中的形成與運作。若行動者的權威具有絕對的性質，或許社會溝通對於他是否能貫徹自己的意志就不是那麼重要，然而，這樣的情況並不多見，即便是有武力做後盾的政府，其倒行逆施的行為仍可能讓它失去權威，包括軍方的支持。<sup>18</sup>

對於社會技能與認同工作的強調，提供一個中程層次（meso level）的權威觀：權威固然有其結構的面向，因為行動者的社會位置形塑他們的社會技能的質與量，但是並非是由結構決定，權威固然有其能動性的面向，但也並非是行動者都有相同的可能性來爭奪權威，因為主宰場域的秩序會讓某些社會技能更為有利。換言之，權威是具備帶有結構色彩的社會技能的行動者，在特定的場域秩序中，透過社會溝通與其他同樣懷有社會技能的行動者的鬥爭結果。當然，若行動者具備社會技能剛好對應到場域秩序，他在鬥爭的過程中便會佔據上風，而容易取得權威，但是這並不代表權威一旦建立後就不會被

---

18 以 Charles Kurzman（1996）對於 1979 年的伊朗革命的分析為例，原先支持巴勒維國王的軍方，因為強大的革命行動，軟化他們對於既有政權的支持，許多士兵接受革命的訴求或是擔心被革命者攻擊，加入革命，而軍方也很快地宣布中立，讓革命勢力取得權力。

挑戰，或是挑戰者始終是落敗的一方，因為當場域秩序變動，或是挑戰者創新性的運用他的社會技能時，誰是權威的答案就會有可能改變（Fligstein and McAdam 2012）。

## 十、結論

托克維爾曾用文化比擬為土壤，民主制度比喻為種子，相同的種子被種到不同的土壤時，會產生出不同的民主果實（de Tocqueville 2003）。本文則將他的比喻進一步延伸，除了種子與土壤，我們還需要考慮這個民主種子是被如何種植的，藉由考察蜈蚣區審議社造組織者的角色，本文指出，作為民主制度的栽種者，組織者與在地的關係影響審議社造的栽種結果。環境因素固然影響參與式預算的運作，這樣的影響必然是透過組織者的中介。如同本文指出，若組織者在認知、展演與象徵的層面上，具備充分的社會技能，並依此達成所需的認同工作，組織者越可能與在地形成 Simmel 意義下的陌生人關係，越可能改變不利或是利用有利的環境，使得包容、公正與促進合作的參與式預算產生。

政治學者認為政治創業家是政治創新與改革不可或缺的角色，政治創業家不見得是個政治人物，他能夠利用資源，靈活與熟練的說服他人支持政治革新與改革（蘇彩足 2017: 10）。本文認為，參與式預算乃至於其他審議論壇的建立固然需要這樣的角色，相較於將不同的政治創新與改革送作堆，本文認為不同類型的政治創新與改革需要不同類型的政治創業家，在以黨派結盟為動力的革新中，行動者需要以與特定黨派建立近的關係，以便動員黨派成員的支持。但是在立基於審議民主的參與式預算革新中，結盟的做法並不適用，組織者是否能成為陌生人是建立更為全面與公正的參與的必要條件，固然參與式預算的運作無疑地受到政治氣候、國家制度和細部遊戲規則的限制，組織者是否能取得陌生人的地位卻影響著這些限制如何對於參與式預算的實作產生影響。以打牌做比喻，懂得打牌的玩家可以把不利的排組

打得有模有樣，不會打牌的玩家即使一手好牌，都可能在牌局中慘敗（Ganz 2000）。本文認為，在參與式預算的賽局中，具備陌生人地位的組織者就是一個會打牌的玩家，總是能讓參與式預算的運作往好的方向發展。

新的民主制度的建立往往面對許多困難，這些困難可能來自於國家的政治制度或是社會的政治文化，阻礙了民主改革的進程。本文則對於民主改革的困難點亮一盞向前邁進的燈，透過培養行動者適當的社會技能，讓他們能夠藉由恰當的認同工作與他人建立合適的社會關係，讓民主制度建立於適合的社會關係上，將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化解推動民主改革所遭遇的難題。最後，在本文發現的基礎上，本文建議幾個可資繼續的研究方向：第一，由於作者在本研究中的位置所造成的曖昧，未來研究可以站在客觀研究者的角度，對於其他民主創新的組織者進行分析與比較，特別是與本文作者有著相同背景的組織者，一方面拓展對於不同組織者的社會技能與認同工作的了解，一方面也可作為本研究的驗證；第二，本文雖然受到 Simmel 的啟發，指出陌生人關係對於民主創新實作的重要性，本文不擬宣稱陌生人是組織者與在地應有的唯一關係，未來研究朝向發掘其他適合民主創新發展的社會關係，不僅能更加了解社會關係與民主運作的關係，同時也指引組織者營造社會關係更多的可能性，豐富他們的文化工具箱（tool-kit），畢竟每個組織者的社會技能並不相同，不是每個組織者都能輕易成為陌生人，若組織者能夠選擇他最有能力完成的認同工作，而這樣的社會關係又能支持民主創新的運作，是件再好也不過的事了！第三，除了參與式預算之外，研究者可擴大探討社會技能與認同工作在其他的民主創新與改革中扮演的角色，讓其他的民主實踐能夠順利推動。

誌謝：本文為科技部「網路崛起的社會運動對台灣的影響：行政—以文化部及台北市政府的參與式預算為例」研究計畫與文化部「深化公民參與暨輔導公所推動公民審議進階社造工作」研究計畫的部分研究成果。作者在此感謝蜈蚣區的朋友

慷慨的提供本文寶貴的資料，讓本研究得以完成。作者也感謝李翊禾、余承瑋、賴瑩珊與郭庭瑄幾位助理在文獻蒐集與資料整理上的協助。本文初稿曾發表於2018台灣社會學年會，從王甫昌、林國明、萬毓澤、葉欣怡與李宛儒等學界同儕，獲得許多極具建設性的意見。最後，作者感謝《台灣社會學》的審查人與編委會對本文的細心閱讀，並給予重要的建議與指正，以及編輯人員對本文的悉心校對，使本文更為圓滿。

## 參考文獻

- 杜文苓，2007，〈審議民主與社會運動：民間團體籌辦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基地公民會議的啟發〉。《公共行政學報》23: 67-93。
- 周佳君，1996，〈逛街機器——一個紡織廠女工的一天〉。頁309-325，收錄於胡幼慧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
- 林宗弘，2005，〈譯序：邁可布洛威與生產的政治〉。頁7-69，收錄於Michael Buroway 著、林宗弘等譯，《製造甘願：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台北：群學。
- 林祐聖，2012，〈公共審議中討論風格的建構：社會關係與社會技能的影響〉。《台灣社會學刊》51: 63-114。
- ，2018，〈強化參與式預算過程中的公民認同，促進民主深化〉。巷仔口社會學，<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8/01/23/linyusheng/>。
- 林祐聖、陳東升，2018，〈當社區營造遇到參與式預算：兩個社區的比較研究〉。《台灣社會學》35: 109-149。
- 林國明，2013，〈多元的公民審議如何可能？—程序主義與公民社會觀點〉。《台灣民主季刊》10(4): 137-183。
- ，2016，〈公民社會與公共審議：一般公民和社團活躍份子的審議傾向〉。《台灣社會學刊》59: 139-186。
- 陳東升，2006，〈審議民主的限制—台灣公民會議的經驗〉。《台灣民主季刊》3(1): 77-104。
- 曾旭正，2014，〈從社區發展到社區營造〉。頁5-18，收錄於《落地生根：台灣社區營造的理論與實踐》。台北：唐山。
- 楊弘任，2014，《社區如何動起來？：黑珍珠之鄉的派系、在地師傅與社區總體營造》。台北：群學。
- 萬毓澤，2015，〈巴西愉港的參與式預算：神話與現實〉。頁29-74，收錄於鄭麗君編，《參與式預算：咱的預算，咱來決定》。台北：財團法人青平台基金會。

- 葉欣怡、林祐聖，2017，〈參與式預算的台灣實踐經驗：以三峽區的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方案試辦計畫為例〉。《民主與治理》4(1): 69-95。
- 葉欣怡、陳東升、林國明、林祐聖，2016，〈參與式預算在社區——文化部推展公民審議及參與式預算實驗計畫〉。《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4(4): 29-40。
- 盧思岳，2014，〈社造永續·公民接力—社造二十年的回顧與展望—民間觀點〉，台灣社造聯盟 (<http://47go.org.tw/article/25866>，取用日期：2017 年 9 月 21 日)。
- 盧葶艷、林雪貴、張碧芬，2003，〈女性主義參與式研究法在護理研究之應用〉。《護理雜誌》50(2): 57-60。
- 蘇彩足，2017，〈公部門推動參與式預算之經驗與省思〉。《文官制度季刊》9(2): 1-22。
- Buroway, Michael 著、林宗弘等譯，2005，〈台灣版序：另一個三十年〉。頁 71-98，收錄於《製造甘願：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台北：群學。  
(Buroway, Michael.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orbin, Juliet and Anselm Strauss 著、徐宗國譯，1997，〈質性研究概論〉。台北：巨流。
- Horkheimer, Max and Theodor W. Adorno 著、林宏濤譯，2008，〈啟蒙的辯證〉。台北：商周。
- Kuhn, Thomas S. 著、程樹德、傅大為、王道還譯，1994，〈科學革命的結構〉。台北：遠流。(Kuhn, Thoma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right, Erik Olin 著、黃克先譯，2015，〈真實烏托邦〉。台北：群學。  
(Wright, Erik Olin. 2010.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New York: Verso Books.)
- Baiocchi, Gianpaolo and Ernesto Ganuza. 2016. *Popular Democracy: The Paradox of Particip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iocchi, Gianpaolo, Patrick Heller, and Marcelo Silva. 2011. *Bootstrapping Democracy: Transforming Local Governance and Civil Society in Brazil*.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rnstein, Mary. 1997. "Celebration and Suppression: The Strategic Uses of Identity by the Lesbian and Gay Movem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3): 531-565.
- Bourdieu, Pierre.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urawoy, Michael. 1998. "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Sociological Theory* 16(1):



- 4-33.
- Carson, Lyn. 2001. "Innovative Consultation Processes and the Changing Role of Activism." *Third Sector Review* 7(1): 7-22.
- Cornwall, Andrea and Rachel Jewkes. 1995. "What is Participatory Research?"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41(12): 1667-1676.
- Davis, James A. 1963. "Structural Balance, Mechanical Solidarit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8(4): 444-462.
- de Tocqueville, Alexis. 2003. *Democracy in America and Two Essays on America*. London, England: Penguin Books.
- Eliasoph, Nina, 1996, "Making a Fragile Public: A Talk-Centered Study of Citizenship and Power." *Sociological Theory* 14(3): 262-289.
- . 1998. *Avoiding Politics: How Americans Produce Apathy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2013. *The Politics of Volunteering*. Malden, MA: Polity Press.
- Eliasoph, Nina and Paul Lichterman. 2003. "Culture in Inter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8(4): 735-794.
- Emirbayer, Mustafa. 1997. "Manifesto 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2): 281-317.
- Emirbayer, Mustafa and Mimi Sheller. 1999. "Publics in History." *Theory and Society* 27(6): 727-779.
- Fernández-Martínez, José Luis, Patricia García-Espín, and Manuel Jiménez-Sánchez. 2020. "Participatory Frustration: The Unintended Cultural Effect of Local Democratic Innovations." *Administration and Society* 52(5): 718-748.
- Fligstein, Neil. 2001. "Social Skill and the Theory of Fields." *Sociological Theory* 19(2): 105-125.
- Fligstein, Neil and Doug McAdam. 2012. *A Theory of Fiel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riedman, Debra and Doug McAdam. 1992.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Activism: Networks, Choices, and the Life of a Social Movement." Pp. 156-173 in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edited by Aldon D. Morris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Ganuza, Ernesto and Gianpaolo Baiocchi. 2012. "The Power of Ambiguity: How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Travels the Globe." *Journal of Public Deliberation* 8(2): Article 8.

- Ganz, Marshall. 2000. "Resources and Resourcefulness: Strategic Capacity in the Unionization of California Agriculture, 1959-1966."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4): 1003-1062.
- Gilman, Hollie Russon. 2012. "Transformative Deliberations: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Public Deliberation* 8(2): Article 11.
- . 2016. *Democracy Reinvented: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and Civic Innovation 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Goffman, Erving.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Anchor Books.
- .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Boston, MA: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 Heider, Fritz. 1946. "Attitudes and Cognitive Organization."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Interdisciplinary and Applied* 21(1):107-112.
- Jasper, James M. 2006. *Getting Your Way: Strategic Dilemmas in the Real World*.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urzman, Charles. 1996. "Structural Opportunity and Perceived Opportunity in Social-Movement Theory: The Iranian Revolution of 1979."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1): 153-170.
- Lerner, Josh. 2014. *Everyone Counts: Could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Change Democrac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ansbridge, Jane M. 1980. *Beyond Adversary Democracy*. New York: Basic Books.
- . 1999. "On the Idea that Participation Makes Better Citizens." Pp. 291-325 in *Citizen Competence and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edited by Stephen L. Elkins and Karol Edward Soltan. University Park, 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Mansbridge, Jane J., Janette F. Hartz-Karp, Matthew Amengual, and John Gastil. 2006. "Norms of Deliberation: An Inductive Study." *Journal of Public Deliberation* 2(1): Article 7.
- Martin, John Levi. 2017. *Thinking through Methods: A Social Science Primer*.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ead, George Herbert.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ische, Ann. 2003. "Cross-Talk in Movements: Reconceiving the Culture-Network Link." Pp. 258-280 in *Social Movements and Networks: Relational Approaches to Collective Action*, edited by Mario Diani and Doug McAdam. New York: Oxford

- University Press.
- . 2007. *Partisan Publ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Nepstad, Sharon Erickson and Clifford Bob. 2006. “When Do Leaders Matter? Hypotheses on Leadership Dynamics in Social Movements.”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1(1): 1-22.
- Pager, Devah. 2003. “The Mark of a Criminal Recor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8(5): 937-975.
- Perrin, Andrew J. 2014. *American Democracy: From Tocqueville to Town Halls to Twitter*. Malden, MA: Polity Press.
- Polletta, Francesca. 2004. *Freedom is an Endless Meeting: Democracy in American Social Movement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2016. “Social Movements in an Age of Participation.”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21(4): 485-497.
- Putnam, Robert D., Lewis M. Feldstein, and Don Cohen. 2004. *Better Together: Restoring the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Simmel, Georg. 1971. “The Stranger.” Pp. 143-149 in *Georg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edited by Donald N. Levin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mith, Jackie. 2008. *Social Movements for Global Democrac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Snow, David A. and Doug McAdam. 2000. “Identity Work Processes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Movements: Clarifying the Identity/Movement Nexus.” Pp. 41-67 in *Self Identity, and Social Movements*, edited by Sheldon Stryker, Timothy J. Owens, and Robert W. Whit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now, David A., E. Burke Rochford Jr., Steven K. Worden, and Robert D. Benford. 1997.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Pp. 235-251 in *Social Movements: Readings on Their Emergence, Mobilization, and Dynamics*, edited by Doug McAdam and David A. Snow. Los Angeles, CA: Roxbury Publishing Company.
- Swidler, Ann. 2003. *Talk of Love: How Culture Matter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all, Sarah. 2008. “Easier Said than Done: Writing an Autoethnograph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7(1): 38-53.
- Wampler, Brian. 2007.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in Brazil: Contestation, Cooperation,*

- and Accountability*. University Park, 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 2012.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Core Principles and Key Impacts.” *Journal of Public Deliberation* 8(2): Article 12.
- Wan, Poe Yu-ze. 2018. “Outsourcing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Experiences in Taiwan.” *Journal of Public Deliberation* 14(1): Article 7.
- Wasserman, Stanley and Katherine Faust. 1994.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st, Candace and Don H. Zimmerman. 1987. “Doing Gender.” *Gender & Society* 1(2): 125-151.